

分类号：

学校代码：10363

密 级：

学 号：



安徽工程大学

Anhui Polytechnic University

硕士学位论文

题目 _____

论 文 作 者 _____

指 导 教 师 _____

学 科（专业） _____

研 究 方 向 _____

论文提交日期： _____年____月____日

分类号： D64

单位代码： 10363

密 级： 公 开

学 号： 2221510128

题 目 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中
华民族观研究（1919-1949）

英文并列

题 目 The Chinese National View of
Early Marxists in China
(1919-1949)

学生姓名： 黄玲玲

指导教师： 张 刚

专 业： 马克思主义理论

研究方向： 思想政治教育

论文答辩日期： 2025 年 5 月 13 日

安徽工程大学学位论文原创性声明

本人郑重声明：我恪守学术道德，崇尚严谨学风。所呈交的学位论文，是本人在导师的指导下，独立进行研究工作所取得的成果。除文中已明确注明和引用的内容外，本论文不包含任何其他个人或集体已经发表或撰写过的作品及成果的内容。论文为本人亲自撰写，我对所写的内容负责，并完全意识到本声明的法律后果由本人承担。

学位论文作者签名：黄玲玲

日期：2025 年 5 月 20 日

安徽工程大学学位论文版权使用授权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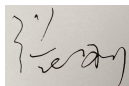
学位论文作者完全了解学校有关保留、使用学位论文的规定，同意学校保留并向国家有关部门或机构送交论文的复印件和电子版，允许论文被查阅或借阅。本人授权安徽工程大学可以将本学位论文的全部或部分内容编入有关数据库进行检索，可以采用影印、缩印或扫描等复制手段保存和汇编本学位论文。

保密 ☐，在_____ 年解密后适用本版权书。

本学位论文属于

不保密 ☐。

学位论文作者签名：黄玲玲

指导教师签名：

日期：2025 年 5 月 20 日

日期：2025 年 5 月 20 日

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中华民族观研究（1919-1949）

摘 要

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中华民族观的形成与发展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特别是在1919年至1949年期间，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中华民族观，不仅深刻影响了当时的民族解放与社会变革，而且为后世的民族理论与实践奠定了坚实基础。因此，深入研究这一时期的中华民族观，对于理解中国历史进程、把握民族关系演变、探索民族复兴路径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旨在通过系统整理与分析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相关著作与论述，揭示其中华民族观的内在逻辑与历史价值，为当下的民族工作提供借鉴与参考。

本研究以1919年至1949年期间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中华民族观为研究对象，通过广泛搜集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中华民族观的相关著作、期刊、论文等一手资料，对这些资料进行系统整理与深入分析，梳理出其中华民族观的理论来源，形成与发展，特征以及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从中提炼出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中华民族观的核心观点，从而梳理出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中华民族观的内在逻辑。通过对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中华民族观进行理论溯源，可以总结出它是对古代“华夷一家”民族思想、近代西方民族主义思潮以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民族思想批判继承、发展创新后而形成的理论成果。在此基础上，文章选取了以杨度、李大钊、恽代英、瞿秋白、杨松、毛泽东为主要代表

的早期共产主义者，通过深入解析他们的民族思想，使我们能够清晰地把握中华民族的概念及演变，中华民族的内部关系及结构，以及他们对中华民族复兴路径的积极探索。这一过程不仅让我们对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中华民族观有了全面的认识，还深刻揭示了其形成与发展的历史脉络。总体特征上，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中华民族观坚定地秉持了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与使命，充分展现了中华民族精神的传承与创新，并巧妙地实现了“多元”与“一体”的辩证统一。从理论层面来看，这一思想成果标志着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在中国初步探索的成功，并且为中华民族话语体系搭建了系统的理论架构。从现实意义上讲，它一方面树立了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念，有效抵御了民族虚无主义的渗透；另一方面，它极大地强化了全民族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升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

关键词：中华民族；中华民族观；马克思主义；“多元一体”；民族复兴

THE CHINESE NATIONAL VIEW OF EARLY MARXISTS IN CHINA (1919-1949)

ABSTRACT

In the process of China's modernization,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Chinese view of the nation occupies a very important position. Especially during the period from 1919 to 1949, the early Marxists' view of the Chinese nation not only profoundly influenced national liberation and social change at that time, but also laid a solid foundation for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the nation in later generations. Therefore, an in-depth study of the Chinese national outlook during this period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understanding the course of Chinese history, grasping the evolution of ethnic relations, and exploring the path of national rejuvenation. This study aims to systematically organize and analyze the relevant writings and discourses of the early Marxists, to reveal the internal logic and historical value of their view of the Chinese nation, and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current national work.

This study takes the Chinese national view of the early Chinese Marxists between 1919 and 1949 as the research object, and collects first-hand materials such as writings, journals and theses on the Chinese

national view of the early Marxists, and then systematically organizes and analyzes them to sort out the theoretical origin,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characteristics, and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of their view of the Chinese nation, and then extracts the theoretical origin,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characteristics, and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of their view of the Chinese nation. The core ideas of the early Marxists' view of the Chinese nation are extracted, and the internal logic of the early Marxists' view of the Chinese nation is sorted out. Through the theoretical tracing of the early Marxists' view of the Chinese nation, it can be summarized that it is a theoretical result of the critical inheritance, development and innovation of the ancient “Chinese and barbarians as one family” national thought, the modern Western nationalist trend and the national thought of the classic Marxist writers. On this basis, the article selects early communists, mainly represented by Yang Du, Li Dazhao, Yun Daiying, Qu Qiubai, Yang Song, and Mao Zedong, and through in-depth analysis of their national thought, we can clearly grasp the concept and evolu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the internal relationship and structure of the Chinese nation, and their active exploration of the path of Chinese national rejuvenation. This process not only gives us a comprehensive understanding of the early Marxists' view of the Chinese nation, but also deeply reveals the historical lineage of its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In general, the early Marxists' view of the

Chinese nation firmly adheres to the original heart and mission of the CPC, fully demonstrates the inheritance and innovation of the spirit of the Chinese nation, and skillfully realizes the dialectical unity of “plurality” and “unity”. From a theoretical point of view, this idea marks the success of the preliminary exploration of Marxist national theory in China, and builds a systematic theoretical structure for the discourse system of the Chinese nation. In practical terms, it has, on the one hand, established a correct historical concep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and effectively resisted the infiltration of national nihilism; on the other hand, it has greatly strengthened the sense of community of the Chinese nation among the whole nation and enhanced the cohes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Huang Lingling(Marxist Theory)

Supervised by Professor ZhangGang

KEY WORDS:Chinese Nation;View of the Chinese Nation;Marxism;Unity in diversity;National Revival

目录

摘 要.....	I
ABSTRACT.....	III
第一章 绪论.....	1
第一节 研究背景与意义.....	1
一、 研究背景.....	1
二、 研究意义.....	1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现状.....	2
一、 国内研究现状.....	2
二、 国外研究现状.....	7
第三节 研究方法与创新点.....	11
一、 研究方法.....	11
二、 研究创新点.....	12
第四节 相关概念界定.....	12
一、 民族.....	13
二、 中华民族.....	15
三、 中华民族观.....	17
第二章 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中华民族观的理论来源.....	19
第一节 中国古代“华夷一家”民族思想.....	19
第二节 近代西方民族主义思潮.....	20
第三节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民族理论.....	21
一、 民族形成与发展的规律.....	22
二、 民族平等.....	23
三、 民族自决.....	24
第三章 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中华民族观的形成与发展.....	25
第一节 中华民族概念及演变.....	25
一、 历史、文化共同体视角下的中华民族.....	25
二、 民族共同体视角下的中华民族.....	28
三、 命运共同体视角下的中华民族.....	30
第二节 中华民族内部关系及结构.....	32
一、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关系及结构的初步构想.....	33
二、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关系及结构的深入思考.....	35
三、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关系及结构的全面认知.....	37
第三节 中华民族复兴路径探索.....	39
一、 从“五族合一”到民族大团结.....	39
二、 从国民性改造到培育中华民族精神.....	41
三、 从民族自决到民族自治.....	45
第四章 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中华民族观的特征.....	49
第一节 对中国共产党初心使命的坚持.....	49
一、 以民族复兴为伟大梦想.....	49
二、 以救亡图存为核心目标.....	50

第二节 中华民族精神的传承与创新	51
一、 传统爱国主义精神的传承	52
二、 革命斗争精神的发扬	53
第三节 “多元”与“一体”在中华民族关系中实现了辩证统一	54
一、 “多元”与“一体”的统一性	54
二、 “多元”与“一体”的差异性	55
第五章 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中华民族观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57
第一节 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中华民族观的理论价值	57
一、 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初步探索的成果	57
二、 系统构建中华民族话语体系的理论框架	58
第二节 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中华民族观的现实意义	59
一、 树立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抵制民族虚无主义	60
二、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	61
结语	63
参考文献	64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71
致谢	72

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研究背景与意义

一、研究背景

2019年9月27日,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一部中国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历史,就是各民族共同缔造、发展、巩固统一的伟大祖国的历史。”因此,深入了解近现代中华民族观念的演进,不仅可以了解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格局形成的历史逻辑,而且能够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坚实的精神力量。本文通过梳理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中华民族观的发展、演变,旨在探析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在中国化过程中,对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寻求中华民族独立与复兴道路的理论 and 实践的指导作用,进一步能够明晰现代中华民族观念在历史进程中如何一步步得以不断丰富、深化和成熟的,从而能够明确中国特色多民族国家的构建理路以及中国共产党制定实施民族政策的理论逻辑。

二、研究意义

以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作为研究对象,通过整体性的视角深入探究其中中华民族观,这一做法不仅极大地丰富了中华民族观的研究维度,而且通过全面而详尽地阐述他们的中华民族观念,为中国共产党在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方面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和逻辑支撑。在此基础上,通过系统分析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关于中华民族的话语叙事,深入剖析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以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核心概念之间的内在联系,为搭建中华民族话语体系建立了初步理论框架。此外,通过深入挖掘并理解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中华民族观及其历史演进,我们能够为新时代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在开展与推进民族工作时提供有效的历史借鉴与实践指导。这一理论体系不仅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宏伟蓝图注入了深厚磅礴的精神力量和思想源泉,还蕴含着跨越时代的智慧,有助于为多民族国家解决民族问题提供重要的理论参考与实践启示,促进全球范

国内的民族团结与和谐发展。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现状

一、国内研究现状

十八大以来,随着习近平总书记不断强化中华民族的话语叙事,关于中华民族的研究也逐渐丰富起来。学界围绕中华民族源流及关系结构、特定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的中华民族观以及中共代表性人物的中华民族观等方面进行了全面且细致的论述。

(一) 中华民族源流及关系结构研究

深入探讨中华民族的源流及关系结构,不仅可以增进我们对自身历史和文化的理解与认同,还能揭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过程,对当前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事业提供坚实的文化根基和历史依据。

1. 中华民族源流研究

研究中华民族史,就必须弄清各民族的源流。建国后,学术界对此展开了大量而详实的研究,取得了丰厚的成果。萧君和主编的《中华民族史》是记述中华民族形成发展历史的开山力作,他认为中华民族的起源于中华大地,历经长时间的文化交融与中原文化的辐射影响,中华民族逐渐形成并发展壮大。在中华民族的起源上,该书没有偏向多元论(“满天星斗”说),也没有偏向一元论(“中原中心”说)^①,而是实现了二者的有机结合,并且注意把中华民族作为整体、实体,以它本身的形成、发展为线索进行综合分析研究^②,更加符合中华民族发展的客观历史实际,意义非凡。陈连开教授自上世纪80年代起便开始投身中华民族的整体研究,其中中华文明与民族起源是他研究的重点。他推翻了形形色色的“外来说”,肯定了中华民族起源于中国本土,修正了中华民族与文化起源于黄河中下游然后向四周扩散的单源中心说的传统观念,证实了中华民族的多源特性,这一特性不仅体现在各地区间发展的多元性和不均衡性上,还展现在一个动态的过

^① 祁庆富:记述中华民族历史的开山力作——《中华民族史》评介[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1,(02):137-138.

^② 覃生.中华民族史研究的新成果——评我国第一部《中华民族史》[J].天府新论,2002,(04):94-95+97.

程中：即各地的文化逐渐汇聚于中原，同时中原文化又以其影响力向四周辐射扩散^①。他们的研究续写了中华民族整体性研究的新篇章，为理解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提供了坚实的学术基础。

2. 中华民族关系结构研究

对中华民族结构的探讨，最著名的莫过于抗战时期以顾颉刚与费孝通为代表的关于中华民族“一元”与“多元”结构的论辩。顾颉刚根据自先秦以来血统及文化的同化、融合使得种族之间的界限逐渐淡化的事实，得出中华民族是由历史上许多“种族”不断融合而成的一个单纯民族^②，中华民族之内不存在其他民族，表明了中华民族一元一体的民族结构。虽然对于彼时团结凝聚全国的各民族力量一致抗战提供了理论支撑，但他忽视了中国自古以来多民族的国情，费孝通对此持有不同意见。他提出要尊重民族学研究的学理性，不能因为要防止敌人的分化，而否认国内作为文化、语言和体质的团体（即“民族”）之存在^③。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一书中，他明确指出“中华民族这个词用来指现在中国疆域里具有民族认同的 11 亿人民。它所包括的 50 多个民族单位是多元，中华民族是一体。”^④自此，在中国广泛确立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民族结构的观念。

自古以来，中国就是一个多元民族共存的国家，因此，深入探究民族间的关系也成为了一项十分重要的研究议题。翁独健主编的《中国民族关系史纲要》可谓是民族关系研究领域的奠基之作。他将民族关系发展分为三个历史阶段，并分析了各个阶段民族关系的特点与表现。他认为，我国民族关系的主流表现为各民族之间的不断接近、相互融合、彼此依存，并且共同携手构建了我们这个伟大而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还有学者致力于区域民族关系的研究，如张刚、伍雄武合著的《云南民族关系的历史与经验》，运用民族学与哲学的跨学科研究方法，对云南地区“多元一体”民族关系的发展脉络、构成特点及成因进行了全面而深入的剖析^⑤。作者认为云南地区民族关系的显著特征为“多元一体”，不同民族之间虽然各具特色、多元共存，但同时也紧密联系在一起，共同构成了一个不可分割的

① 陈连开.论中华文明起源及其早期发展的基本特点[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0,(05):22-34.

② 顾颉刚.中华民族是一个[J].益世报·边疆周刊,1939(09):1.

③ 黄兴涛.重塑中华:近代中国“中华民族”观念研究[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270.

④ 费孝通主编.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修订本)[M].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9:3.

⑤ 张刚,伍雄武.云南民族关系的历史与经验[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

整体。

(二) 特定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的中华民族观研究

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持续扩展并深化关于中华民族的话语表达,基于此,学界对中国共产党的中华民族观也开展了丰富的研究。学界通常选取特定的历史时期来研究中国共产党的中华民族观念,目前的研究重点主要集中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尤其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中华民族观念。

自2000年以来,学界开始关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中华民族观。2005年,陈艳飞率先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中华民族观的演变及其影响(1921—1949年)》一文,指出中国共产党在抗战前后对中华民族的属性认识实现了从政治共同体向民族共同体的转变,这也让中国共产党的中华民族观产生“质”的变化,并揭示这一过程“深刻地影响着中国共产党对民族权利的认识与国家结构形式的选择^①。”此后,林春逸、刘丽萍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中华民族观演变探究》中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中华民族观演变分为早期萌芽、基本形成和不断发展三个阶段:“1921~1934年,‘一盘散沙’的社会状况下,在上下求索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中华民族观初步形成。1935~1939年,中国共产党对中华民族的本质属性、组成要素、内部结构及其层次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论述,这一过程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关于中华民族观念的基本框架得以确立。1940~1949年,中国共产党在回答‘中国向何处去’的时代之问中,发展了中华民族观^②”。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中华民族观的研究最为充分,学者张太原《抗日战争与中共的中华民族观的形成》一文揭示全民族抗战时期中共的中华民族观发生的四个根本性的变化,表明了中共对“中华民族”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理解和阐释^③;李臻《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中华民族观的转型与发展》一文“在解读抗日战争历史背景的基础上,从中华民族的自觉与解放、中华民族的涵义与构成、中华民族的整体性和中华民族的多元性等四个方面对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中华民族观的转型与发展进行阐述^④。”总体而言,学者们普遍认为抗日战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

^① 陈艳飞.中国共产党中华民族观的演变及其影响(1921—1949年)[D].北京:中央民族大学,2005.

^② 林春逸,刘丽萍.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中华民族观演变探究[J].广西民族研究,2024,(01):1-8.

^③ 张太原.抗日战争与中共的中华民族观的形成[J].中共党史研究,2016,(03):52-62.

^④ 李臻.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中华民族观的转型与发展[J].民族论坛,2013,(05):17-19.

中华民族观的成熟阶段。

(三) 中共代表性人物的中华民族观研究

梳理既有研究发现,目前学界对中共代表性人物的中华民族观关注也颇多,主要集中于李大钊、瞿秋白、毛泽东、周恩来等代表人物的民族理论和实践。

1. 李大钊的中华民族观研究

学界主要从民族复兴、民族自决、“新中华民主主义”思想等方面,对李大钊的中华民族观展开深入的研究。对李大钊民族复兴思想的研究主要从其产生的时代背景和理论渊源,主要内容和发展过程,历史价值和现代启示等几个方面进行全方位的论述。^①对李大钊民族自决思想的研究既有从常规思路出发根据不同的历史阶段,探讨其民族自觉思想的发展演变过程的^②,也有另辟蹊径对他在建党前后民族自觉思想加以明确区分并追流溯源的^③。对李大钊“新中华民族主义”思想的研究颇多,学者们既有从其产生的历史背景、思想内涵、历史影响角度出发进行探讨的^④,也有将“新中华民族主义”与“新亚细亚主义”进行横向对比分析,并结合李大钊从“新中华民族主义”到马克思主义的纵向思想飞跃,从而挖掘“新中华民族主义”的理论意涵^⑤;又有结合历史时代背景,阐述李大钊“新中华民族主义”在观念形态上的价值^⑥。

2. 瞿秋白的中华民族观研究

学界早年间对瞿秋白中华民族观的研究主要围绕其《现代民族问题讲案》一书,以此阐述他对民族的本质、民族的形成以及民族发展趋势、民族问题历史阶段的划分、民族问题阶级性以及民族主义等方面的认识。^⑦近几年,学者们开始以

① 详见朱婷婷.李大钊民族复兴思想探究[D].陕西师范大学,2021. 李涛容.李大钊民族复兴思想研究[D].吉林建筑大学,2023. 王丽霞.李大钊民族复兴思想研究[D].东北师范大学,2021.

② 周忠瑜.浅谈李大钊的民族平等和民族自决思想[J].青海民族学院学报,1989,(03):36-40.

③ 郑大华.李大钊“民族自决”思想的再研究[J].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20,49(04):83-90.

④ 详见张三南,吕伟波.李大钊《新中华民族主义》探析[J].甘肃社会科学,2014,(04):51-54.

赵壮道.李大钊“新中华民族主义”思想及其影响[J].史学月刊,2019,(08):130-132.

⑤ 王锐.锻造“政治民族”——李大钊“新中华民族主义”的理论意涵[J].开放时代,2019,(02):122-135+8-9.

⑥ 郑师渠.中华民族实现由自在转向自觉的鲜明标志——论李大钊的《新中华民族主义》[J].史学史研究,2020,(04):17-20.

⑦ 详见聂长久,张敏.论瞿秋白的民族观[J].吉林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9,(01):27-30.

吴汉全.瞿秋白与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中国化[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

更加全面的视角探讨瞿秋白民族革命思想,从其产生的背景及其阶段的划分、主要内容、历史价值和历史局限性等方面展开了充分且系统的论述^①。

3. 毛泽东的中华民族观研究

学界对毛泽东中华民族观的研究十分丰富,包括但不限于对其民族平等团结思想,民族区域自治思想,民族自信思想,民族独立思想,民族统一战线思想,民族教育思想,民族经济思想,民族协商思想,民族哲学思想等方面的研究。限于篇幅,仅简要概括研究最多的民族平等、团结以及民族区域自治理论和政策的总体情况。对毛泽东民族平等、团结思想的研究,既有立足于理论渊源、主要内容、历史地位以及当代价值的系统论述^②,也有着重于对毛泽东民族平等团结思想在新历史阶段进一步丰富、发展的内容梳理^③。学者对毛泽东民族区域自治思想的研究,既包含对其形成条件、主要内容、重要原则和方法、意义和启示等方面的综合思考^④,也有毛泽东对于新中国不实行联邦制而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决策的历史必然性的深刻分析^⑤,还有结合毛泽东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部分地区的具体实践进行的分析论述^⑥。

4. 周恩来的中华民族观研究

对周恩来中华民族观的研究也颇多,不仅有对他民族观的系统研究,也有对其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民族繁荣、民族区域自治以及民族统一战线等具体民族理论的探讨。以前三者为例,对周恩来民族观的研究,既有对周恩来以“民族平

版),1998,(06):42-45.

① 详见韩颂刚.瞿秋白民族革命思想研究[D].山东大学,2020. 杨波.瞿秋白民族观研究[D].燕山大学,2015.

② 岳凯娜.毛泽东民族平等思想及其当代价值研究[D].太原:山西师范大学,2020.

③ 详见丁橡雨,周显信.论毛泽东民族团结思想的深刻内涵及当代发展[J].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13(01):10-15.

汤庭芬,黄永明.毛泽东关于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的学说[J].社会主义研究,1993,(06):12-16.

④ 详见桑杰.关于毛泽东民族区域自治思想的几点思考[J].红旗文稿,2013,(24):13-16.

娜仁琪琪格.毛泽东的民族区域自治思想研究[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8,(02):61-64.

安兴伟.毛泽东关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思想与实践研究[D].华东师范大学,2013.

⑤ 宋月红.毛泽东关于新中国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决策研究[J].中国藏学,2008,(03):128-137.

⑥ 详见杨耀,张宇,姜爱军.论毛泽东民族区域自治思想在内蒙古的实践[J].理论研究,2013,(06):22-28.

李惠康,訾亚军.论毛泽东对新疆自治区建立的贡献[J].内江师范学院学报,2015,30(01):98-101.

等、民族团结、各民族共同繁荣”为主要内容的民族观的全面阐述^①，也有对周恩来关于民族问题的理论观点的具体分析^②。对周恩来民族平等思想的研究大多围绕他提出的实现各民族“事实上的真正的平等”重要思想进行的理论与实践的探索而展开论述^③。对周恩来民族团结思想的研究，既有学者按照其基本理论、主要内容及特点、意义及启示等方面进行系统研究^④，也有学者按照时间脉络梳理周恩来自少年至晚年的民族团结思想^⑤。

二、 国外研究现状

国外关于早期中华民族观的研究直到 90 年代才显现端倪，到目前为止，有关成果还只限于个案(个别人物的中华民族观)和断代(某一时期的中华民族观)研究。其中代表作品有：美国学者费正清的《美国与中国》；康纳·沃克的《马克思列宁理论和战略中的民族问题》；查莫斯·约翰逊的《农民民族观与共产党政权：革命中国的兴起，1937-1945》；澳大利亚学者詹姆斯·雷博德的《重构中华民族观：从清朝的边疆民族到中华民族》；英国学者冯客的《近代中国之种族观念》；日本学者松本真澄的《中国民族政策之研究：以清末至 1945 年的“民族论”为中心》等。这些著作围绕中华民族观的生成原因和发展演进、中国共产党的中华民族观以及代表性人物的中华民族观展开了丰富的研究。

（一） 中华民族观生成原因和发展演进的研究

真正意义上首次严肃探讨中华民族观念的书籍，当属费正清的《美国与中国》。尽管该书的主旨并非专注于民族观，但费正清在书中对于民族主义的相关阐述，却为后续该领域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石。费正清提出民族主义是中国面对西方列强的入侵而出现的被动回应，是中国传统社会吸收新的现代能动因素-西方式的民族主义从而发挥其改造作用的过程。^⑥这对于了解中华民族观念兴起的历史背景

^① 详见马进卫.浅析周恩来的民族观[J].云南社会科学,1999,(S1):128-131+166. 罗庶长.周恩来的民族观和他对建立广西壮族自治区的贡献[J].广西民族研究,1998,(03):13-15.

^② 张忠江,陈秀英.论周恩来的民族观——纪念周恩来诞辰 100 周年[J].黑龙江民族丛刊,1998,(02):30-32.

^③ 李珍.论周恩来民族平等思想——“事实上的真正的平等”[J].传承,2014,(05):32-33. 徐杜海,周红禄.周恩来的民族平等思想与实践[J].重庆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05):11+110.

^④ 郭艳.周恩来民族团结思想研究[D].兰州:西北民族大学,2011.

^⑤ 张少春.团结与改造:周恩来民族团结思想研究[J].思想战线,2024,50(04):51-62.

^⑥ 崔玉军.西方关于中国民族主义的研究:范式与主题[J].国外社会科学,2009(05):114-121.

和思想来源提供了有益的视角。詹姆斯·雷博德在《重构中华民族主义：从清朝的边疆民族到中华民族》（以下简称《重构中华民族主义》）一书中同样审视并阐述了1921年至1949年期间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在中国本土化发展的历史进程，指出西方民族理论传入中国后，中国会借用日语中的“民族”一词来翻译“nation”，这一译法在中国普遍传播，并实现了本土化的应用，逐渐形成了“符合中国文化、民族与政治统一国情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理论与政策”^①。此外，还有学者强调了外部侵略对中华民族意识认同的促进作用。康纳·沃克在1984年出版的专著《马克思列宁理论和战略中的民族问题》中，深入探究了那些采用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国家所普遍存在的强烈民族主义情绪的问题，提出日本侵略对“中华民族”的促成作用，认为外敌存在是民族意识存在的一个必要条件。^②奥维尔·谢尔在《中国之殇》一文中表示，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在西方列强侵略下所经历的屈辱历史，对塑造现代中国民族观念起到了关键作用。在这个过程中，日本因其特殊的角色——既实现了自身的现代化，又发动了对中国的侵略战争——给中国精英和民众带来的心理震撼尤为深刻，这种影响甚至超过了西方国家的渗透与殖民。这一观点强调了外部压力与侵略在推动中国民族观念转变中的重要作用，特别是日本对中国的侵略行为所产生的深远影响。^③冯客的《近代中国之种族观念》一书是研究近代中国“民族”观很好的参考书。该著作阐述了从清末直至20世纪40年代，随着“民族观”内涵的不断变化国人民族意识的转变过程。但这本书仅聚焦于清末、民国期间思想家以及当政者的“民族”观念，缺乏对其他历史时期、社会阶层或思想领域的广泛考察与深入分析。^④

（二）中国共产党的民族观研究

对中国共产党的民族观的研究也是海外学者研究的一个重点，学者们一般选取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通过国共两党民族观的比较研究来梳理中华民族观的发展

^① 李臻,金炳镐.西方学界关于中国共产党中华民族观的研究初探——读詹姆斯·雷博德的《重构中国民族主义:从清朝的边疆民族到中华民族》[J].西北民族研究,2016(02):73-82.

^② 松本真澄,鲁忠慧.评日本及欧美学者对中国民族问题之研究[J].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2):17-23.

^③ 梁雪村.错置的议题:西方中国民族主义研究的得与失[J].外交评论(外交学院学报),2015,32(02):29-48.

^④ 松本真澄,鲁忠慧.评日本及欧美学者对中国民族问题之研究[J].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2):17-23.

脉络。松本真澄所作《中国民族政策之研究——以清末至 1945 年的“民族论”为中心》（以下简称《中国民族政策之研究》），是一部系统论述中国历史上自清末到抗战结束的 1945 年之间的民族观、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变迁过程的书籍，通过比较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并结合抗日战争爆发后回族和蒙古族自觉向中华民族认同的事实，论述了以孙中山为代表的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思想、民族理论的形成与发展。其中她认为中国共产党关于中华民族领土范围的认识，经历了从建党初期的中国本部的“汉”民族代表了中华民族全部地域范围，到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时转变为囊括汉无产阶级以及中华民国主权范围内的即除了“民族的背叛者”之外的、居住在“五族之地”内的全体人民。总而言之，根据松本真澄的论述，中国共产党所界定的“中华民族”的范畴，在历史背景的演变中呈现出逐渐扩展的趋势。^①查莫斯·约翰逊在其《农民民族观与共产党政权：革命中国的兴起，1937-1945》一书中，从民族主义视角分析了共产党的成功与国民党的失败。书中对比了两党在民族策略上的差异，指出日本侵略打破了中国农民的传统乡土观念，使他们认识到反抗是唯一的出路，但农民阶层自身无法产生领导力量。共产党适时地满足了这一需求，通过建立地方军事组织，共不仅引领了已被广泛动员的广大农民阶层，还积极协助他们进行组织架构的建设，并为他们提供意识形态上的指引。这种成效显著的民族意识激发策略，确保了共产党在中国取得领导地位，进而实现了在军事斗争中的胜利。总结而言，在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成功地“动员了农民的民族主义情感”，而毛泽东等领导人则是在积极“构建和推动中华民族主义”的过程中取得了胜利。这一观点得到了众多学者的广泛认同，他们认为中国共产党在思想层面对国民党的优势，部分归因于他们有效地把握并激发了民众中的民族主义情绪^②。”

（三）对中共代表性人物民族观的研究

海外学者在对中国共产党的民族观的梳理过程中，对中共一部分代表人物如李大钊、毛泽东、杨松、王明等人的民族观也进行了总结，对于研究中共的民族观起到了很好的辅助作用。詹姆斯·雷博德在《重构中华民族主义》中着重研究了 20 世纪前期中共主要领导人中华民族观的演变和发展的过程。关于李大钊，中

^① 松本真澄.中国民族政策之研究——以清末至 1945 年的“民族论”为中心[M].鲁忠慧,译.北京:民族出版社,2003(1).

^② 乔兆红.阐释与启示:海外关于中国民族主义问题的研究[J].安徽史学,2017,(05):56-62.

共早期的一位杰出领导人，对他的中华民族观念，雷博德有如下见解：李大钊所理解的“民族自决”，其核心理念与孙中山不谋而合，均强调在面对外国帝国主义的压迫时，中华民族——这一多元民族的集合，应作为一个整体来争取政治上的独立自主。他并不支持陈独秀及党内部分人士的观点，即主张蒙古等边疆少数民族从中国主体分离，以实现他们所谓的“民族自决”。关于毛泽东的中华民族观，作者指出，毛泽东同蒋介石一样，均致力于构建一种包容全体中国人的新型集体认同，这种认同强调的是中华民族作为一个统一且不可分割的整体，超越了种族和阶级的差异与隔阂^①。松本真澄在《中国民族政策之研究》中对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民族观的论述主要集中在抗日战争期间，以毛泽东、王明、杨松为主要代表，系统论述了他们对中华民族的理解由抗日战争前的向汉族的同化论逐渐转为反对帝国主义的命运共同体论。她指出，王明在莫斯科起草的“八一宣言”中影射的中华民族包括 ethnic（民族）群体在内的所有居住于中国境内的人，除了卖国者以外。“过去充满不信任和仇恨之念的汉、满、藏、苗、夷、番等各民族，已经成为紧密团结一致抗日的中华民族”。杨松也认为除了与日本勾结的汉奸、蒙奸、回奸等背叛者之外，都是“具有 national（民族）意识的”的中华民族。可以说中国是由具有“抗日意识”的诸“民族”构成的统一多民族国家。此外，她提出毛泽东在《论新阶段》这篇文章中，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解释“三民主义”的内涵，从而产生了“团结中国=中华民族，保卫领土”的意义指向。作者将其称之为新的中华民族概念的诞生。松本真澄认为杨松、毛泽东、王明在这个时期相继出现的言论，共同之处在于主张团结诸 ethnic（民族）群体，组成中华民族的观点。意味着在对抗帝国主义方面，各级 ethnic（民族）群体是以与汉人平等、“不能分离”的命运共同体论而出现的^②。总体而言，海外学者对国内马克思主义者民族观的研究还不是很多，主要集中在中共发展史上各个阶段的领导人物，研究对象的范围和内容还有待拓展与深化。

通过国内外研究现状的分析，我们了解到学界围绕“中华民族”这一主题构建了系统全面的话语体系，让我们能够对“中华民族”之过去、现在和未来有一

^① 李臻,金炳镐.西方学界关于中国共产党中华民族观的研究初探——读詹姆斯·雷博德的《重构中国民族主义:从清朝的边疆民族到中华民族》[J].西北民族研究,2016(02):73-82.

^② 松本真澄.中国民族政策之研究——以清末至1945年的“民族论”为中心[M].鲁忠慧,译.北京:民族出版社,2003(1).

个清晰的认识和总体的把握，也对中国共产党在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路上的核心领导作用有了更直观深刻的感受。但总体上来看，学界关于早期共产主义者的中华民族观往往以个体为研究单位，没有建立有效的联系，缺乏系统地梳理，值得我们进一步整理和挖掘。

第三节 研究方法与创新点

一、 研究方法

（一） 文献研究法

通过知网、国家数字图书馆等数据库及学校图书馆资源，广泛搜集关于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中华民族观的相关著作、期刊、论文等一手资料，并对这些资料进行系统整理与深入分析，通过对比不同学者的观点，追溯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中华民族观的形成背景、发展历程及其核心要义。在此基础上，提炼出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中华民族观的核心观点与理论贡献，为后续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

（二） 跨学科研究法

了解和把握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中华民族观，是一个多维度、跨学科的研究课题。除了民族学科的深入探究，还需广泛借鉴语言学、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及心理学等多学科的知识与理论。通过这一综合视角，不仅能深入挖掘中华民族观的丰富内涵，理解其语言表述与文化遗产，还能揭示其在中国革命与建设中的实践价值，以及对中国社会政治结构、民族关系和社会心理产生的深远影响。这种跨学科的研究方法，有助于我们更全面、深入地理解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中华民族观，为当代民族理论与政策提供有益的启示。

（三） 比较分析法

以不同代表人物的民族思想为对象，进行系统的对比与剖析。通过比较他们在中华民族定义、民族关系处理、民族发展路径等方面的异同，揭示其思想的演变轨迹及内在逻辑。同时，结合时代背景与社会环境，分析这些因素如何影响他们的民族观形成。此过程有助于深入挖掘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中华民族观的独特性与普遍性，为当代民族研究提供借鉴。

二、 研究创新点

(一) 研究对象的创新

本研究超越了以往较为局限的研究范围，采用整体性和系统性的视角，对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中华民族观念进行了全面而深入的考察。目前学界主要从中国共产党这一主体出发探讨其民族观的发展演进，或是独立阐述某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民族思想，缺乏从历时角度论述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民族观的理论思考与政治实践，本文正是在以上契机下，按照时间脉络阐述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者的中华民族观，以期对该历史阶段的中华民族观进行细致梳理并挖掘其历史意蕴和时代价值。

(二) 话语体系的拓展

本文深入且详尽地追溯了 1919 年至 1949 年间马克思主义者中华民族观念的演变轨迹，系统性地归纳整理了这一关键历史时期马克思主义者围绕中华民族所展开的话语表述与叙事框架。在此基础上，文章深刻剖析了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以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核心话语的内在逻辑结构及其相互之间的紧密联系，不仅为中华民族话语体系增添了新的维度与深度，而且实现了对该话语体系的扩展与优化，使之更加全面、深入地反映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在推动中华民族复兴历程中独特贡献。

第四节 相关概念界定

2019 年 9 月召开的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了关于中华民族历史的重要讲话，明确指出中华民族是各族人民在长期历史发展中形成的统一的命运共同体。因此，要了解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中华民族观念的演进，就有必要对各民族融汇为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的历史进行深入了解。而要充分理解中华民族观念，黄兴涛提出“主要由认同‘中华民族’这个一体化的大民族共同体；关切其共同的安危荣辱，维护其权利尊严，以摆脱外来欺压，实现独立解放

和现代发展两方面的内容构成。”^①从他对中华民族观念的界定中，我们可以看出其核心是人们对于“中华民族”这个民族共同体的心理归属及维护意识。因此，为了更好地理解本文所述内容，笔者将对“民族”、“中华民族”、“中华民族观”这三个基本概念进行简要剖析。

一、 民族

民族是人类社会的特有现象，一般指具有共同历史、文化、语言、宗教或地域等特征的一个人类集合体，但民族并不是一个静态的实体，它的内涵和范畴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有所变化。在古代汉语中，民族多指代族群、部落或宗族，强调血缘或种族的联系，是相对较小的人们集合体。到了近代以后，民族划分标准打破了以往地域、血缘的限制，更加强调的是民族成员之间的文化、生活方式和情感联系，是相对较大的人们集合体，如我们日常所说的汉族、满族、回族等等，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期间，人们也常用“民族”指代中华各民族凝聚而成的一致对外的整体，即“中华民族”。

关于汉语中“民族”一词的出处，在学界曾引起广泛争议，相当一部分学者认为这个词是近代由日本创造并传入中国的舶来品，然而近几年，国内已有多位学者在古代典籍、文献中发现“民族”一词的身影，例如2001年学者茹莹依据她业已掌握的史料认定，唐代李筌撰写的《太白阴经》，在其序言中可见“民族”一词的最早使用，其中写道“愚人得之以倾宗社，灭民族”，^②但此处“民族”一词尚不具备现代民族含义，应理解为“民众”的意思。2004年学者郝时远对“民族”一词的源流进行了考辨，认为南朝宋齐时期道士顾欢的《夷夏论》所言“今诸华士女，民族弗革”^③是“民族”一词使用的最早例证^④，而这里“民族”主要用来区分宗族之属和华夷之别。由此可见，在古代汉语中，“民族”概念更多地涉及到族群、部落或宗族的划分，而不是现代意义上具有共同文化、语言、历史等特征的民族概念。

目前学界普遍认为，具有现代意义的民族概念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尤其

^① 黄兴涛.重塑中华:近代中国“中华民族”观念研究[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4.

^② 茹莹.汉语“民族”一词在我国的最早出现[J].世界民族,2001(06):1.

^③ (梁)萧子显.南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2:934.

^④ 郝时远.中文“民族”一词源流考辨[J].民族研究,2004(06):60-69.

是鸦片战争以后,近代的民族资产阶级吸收西方民族主义思想的影响从古代汉语的话语体系中转型的。1870年前后,早期维新思想家王韬在其文《洋务在用其所长》中指出了中国民族众多的现实,文中“民族”一词指代的的就是具有共同历史、文化等特征的人们集合体,他说:“我中国乃天下之至大之国也,幅员辽阔,民族殷繁,物产饶富。”^①此后,梁启超、章太炎等思想家们也在文章中广泛使用“民族”一词。1899年,梁启超发表《自由书·论强权》一文,三次提及“民族”一词,指出当时强大民族对弱小民族之间的强势压迫^②。此后梁启超根据欧洲法学家伯伦知理对民族的界定,并结合自己的认识,在1903年的文章《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对“民族”进行了定义:“同种之人,因共一种之生活,故发生一种之感情,谓之民族。”^③这个定义指出了“民族”是由同一种族的人因为共同的生活方式而产生的一种共同的情感和认同感,强调的是民族成员之间的文化、生活方式和情感联系,而非仅仅基于血缘或种族的联系,他对于民族的界定对后来中国的民族主义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成为了中国现代民族概念发展的重要里程碑之一。

十月革命胜利后,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开始传入中国,之后,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中有关民族定义、民族形成与发展的规律以及民族自决等内容逐渐在中国传播开来,深刻影响了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民族观念,也进一步促进了现代民族观念的普及。1926年初,瞿秋白作《现代民族问题讲案》一文,提出“民族者乃因资本主义之发生及发展而形成之一种人类的结合,有内部的经济关系,即共同之地域以及共同之语言文化等者也。”^④他对民族的定义涵盖了民族形成的历史条件、经济基础、地域特征以及语言文化等多个方面,是比较全面而深刻的。1929年,李达发表了《民族问题》一书,这是中国第一部运用马克思主义系统研究民族问题的论著,他在书中详细介绍了斯大林关于民族的定义,并将民族定义为“是历史所形成的常住的人们共同体,并且是因共同的言语,共同的居住地域,共同的经济生活及表现于文化的共同心理而结合的人们共同体”。^⑤这不仅传承和发扬了斯大林的民族定义,也深刻揭示了民族作为一种社会历史现象的本质特征。

①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3)[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143.

② 梁启超.梁启超全集(第二集)[M].汤志钧,汤仁泽,编.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76.

③ 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13.

④ 瞿秋白.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 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490.

⑤ 李达.李达文集 第1卷[G].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564.

纵观汉语中“民族”概念演变的过程不难发现,“民族”一词的定义从古代话语体系转向近代话语逻辑主要是受到西方民族主义思潮以及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影响,它的内涵也会随着历史的推移不断深化和拓展,只有以历史的眼光辩证地看待“民族”这一人类社会的特有现象,我们才能拨开其复杂和多样的形式抓住其本质特征从而更加理性地加以认知。

二、 中华民族

“中华民族”一词诞生于20世纪初,最早指代“汉族”,后来逐渐发展为中国境内所有民族的统称,是一个具有深厚历史底蕴、高度文化认同感的民族共同体。梁启超与杨度等人,是“中华民族”概念较早的倡导者和使用者。^①1902年,梁启超在《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文中写道:“上古时代,我中华民族之有海思想者厥惟齐。”这是目前所知“中华民族”一词的最早出现,它所指代的是从古华夏族发展至今、不断壮大的汉民族。此后,杨度也在文章中频频提及“中华民族”。1907年,杨度在《金铁主义说》一文中,多次使用了“中华民族”一词,但有别于梁启超以汉族这一主体民族指称中华民族整体的狭隘视角,他明确将中华民族定性为文化民族,他认为判定一个人是否为中华民族的一员,不在于地域、血统的区别,就在于他是否认同和接受“中华民族”的文化。根据这一标准,杨度将满族纳入中华民族,而将文化落后、语言有异的蒙、回、藏等族暂时排除在中华民族的范围之外,但他坚信只要实行“满汉平等、同化蒙、回、藏”的“国民统一之策”,在不久的将来,五族将逐渐“混合”成为整体的“中华民族”。这表明他同梁启超一样,认识到“中华民族”是自古以来多民族融合的结果,并且已初步形成“中华民族”是涵盖中国境内汉、满、蒙、回、藏等各民族共同称谓的意识。辛亥革命以后,孙中山以杨度“五族合一”的民族思想为基础提出了“五族共和”的民族主张,“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②此外,孙中山还在颁布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中以法律的形式保障民族的平等权利。孙中山先生提出的“五族共和”、“五族平等”的民族思想,有效的打破了民族间的隔阂,增进各民族

^① 黄兴涛.现代“中华民族”观念形成的历史考察——兼论辛亥革命与中华民族认同之关系[J].浙江社会科学,2002(01).

^② 张革,张磊.孙中山卷(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127.

之间的团结和融合。“五族共和”的理念虽然已包含民族一统的内涵，与现代“中华民族”概念意义趋近，但是五族显然未包含中国境内五十六个民族，这是其最明显的弊端。

俄国十月革命尤其是五四运动以后，一大批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在中国广泛传播，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开始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中国的具体国情相结合探索中华民族的独立与解放道路，在这期间，他们对于中华民族的认识与理解也不断深化。李大钊区别于时人或以“血统”或以“畛域”等标准划分界定的中华民族，旗帜鲜明地提出“凡籍隶于中华民国之人，皆为新中华民族矣”，还摆脱了政治、法律的硬性约束，认为不论政治体制或法律体系是否统一，只要是在共同的历史背景和文化遗产下生活的民众或国民，都可以被视作同一个民族，这就将当时隶属日本政府的台湾人民纳入到中华民族的大家庭之中。李大钊自觉而公开地标举再造现代“中华民族”旗帜，比较系统、全面地阐释了中华民族的概念和范畴，他的中华民族观念也为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中华民族观奠定了思想基础。恽代英认为中华民族是一个上位概念，它涵盖了汉族以及其他少数民族。瞿秋白对中华民族的认识包括对内与对外两个方面：对内中华民族内在地包含着中国境内的各个民族，其本质是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文化群体或者共同体，存在着共同的经济基础、生活地域、语言文化等基本要素；对外中华民族代表了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中国的国家民族和整体民族，与主权挂钩，可以代表国家行使权力，也是国家政治层面上的民族。在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中，杨松是第一个对“中华民族”及其概念进行理论阐述的人。他从列宁主义的民族理念出发，得出中华民族是一个近代民族的结论，并站在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立场上分析中华民族的构成成分，认为汉人以及汉化群体构成了中华民族，中华民族在本质上也是历史、文化共同体，而究其根源可以追溯到历史上形成的不同部落、种族。毛泽东基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民族观念，秉持着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科学地分析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发展历史和内部结构，从中揭示了中华民族各兄弟成员之间休戚与共、不可分割的关系。他也是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中对“中华民族”的整体性及其内在联系作出科学、完整阐述的第一人，正是基于毛泽东对“中华民族”内涵的科学阐释，使中国共产党确立了“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中华民

族是代表中国境内各民族之总称^①”的思想。

需要注意的是，“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概念虽然是 20 世纪之初才出现在大众视野之中的，但是作为一个实体，则是在中华文明数千年的历史进程中逐渐形成并壮大的。

三、 中华民族观

中华民族观念围绕中华民族本身的形成、演变、发展及其与现代国家的关系而构建，^②涉及人们对中华民族历史文化传统、身份认同、民族格局、族类关系以及发展走向等多方面的认知和理解，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社会政治观念体系。自梁启超首提“中华民族”这一概念后，此后不同的政治派别均对其有不同的解读。满清政府用之以缓和紧张的民族关系，立宪派用之以联合各省共同治理，革命派用之以团结海内外华人共建民国，中国共产党用之以凝聚全民族建立新中国并在新时期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复兴^③。虽然不同的政治派别对“中华民族”观念的阐释和运用出发点和具体目标各异，但是他们的中华民族观念的内涵始终包含着以下两个基本范式：中华民族是什么的问题以及我们是在何种语境和意义上运用“中华民族”这一概念的问题。

多年来，我国学者对此进行了多方位的探讨与论述，然而，由于各自的政治立场、文化背景以及所秉持的民族理论存在差异，他们对于中华民族及其相关概念的认识和理解也相应地展现出一定的多样性。有人视其为中国境内所有民族的总体称谓；有人将其视作中国的“国族”；有人将其与中国的国民等同起来；有的人认为“中华民族是整个的”；还有的人认为“中华民族是一个”。学者郑大华指出，虽然人们对于这个问题的理解众说纷纭，但都普遍认为经过长期的民族交流与融合，中国各民族之间已经形成了紧密相连、不可分割的关系，不存在纯血统的民族。虽然对“中华民族”及其相关概念存在多元化理解和表述，但这些理解和表述都承认“中华民族”是一个由各民族结合而成的共同体，同时也承认其他民族的存在。这些不同的理解和表述主要是为了抵御日本帝国主义利用中国多民族的特点来煽动民族矛盾、瓦解民族团结，从而达到其征服中国的险恶目的。

^① 郝时远.毛泽东对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历史贡献[J].民族研究,1993,(05):1-10+39.

^② 周平.中华民族观念的时代意义[J].理论与改革,2023(03):43-56.

^③ 王正文.近代中国“中华民族”观念的嬗变[D].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2020.

因此，强调“中华民族”的共同体性质，维护中国的主权独立、领土完整和中华民族的团结是至关重要的。^①这些观点的倡导者中最为学界所熟知的便是顾颉刚、黄兴涛这两位学者，他们对中华民族观念的界定和阐述可以说是这些观念的典型代表。顾颉刚认为中华民族不是由多民族组合而成的大民族共同体，而是由历史上多种族经过迁徙、同化融合而成的单一纯粹民族，“凡中国人都是中华民族——在中华民族之内我们绝不该再析出什么民族”，^②强调了中华民族一元一体的民族格局，在这其中“共同民族意识”实现了对不同宗教信仰、经济利益、社会地位的人们的凝聚作用，可以说他的这一观点突出了中华民族的整体性特质，对抗战时期团结人心遏制分裂发挥了不可忽视的现实价值。黄兴涛则以容纳了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在内的大民族共同体之“中华民族”为研究主体，将“由此概念所直接传导和涵括的族类认同意识及其运用展开的民族一体化理念和信念等称为现代中华民族观念”，^③具体而言就是“主要由认同‘中华民族’这个一体化的大民族共同体；关切其共同的安危荣辱，维护其权利尊严，以摆脱外来欺压，实现独立解放和现代发展两方面的内容构成。”^④他对于中华民族观念的解读强调基于“中华民族”这个多民族共同体而产生的认同、关切、维护以及发展的意识与信念。虽然两位学者对于“中华民族”的构成及格局各执一词，但不可否认的是他们都表明了在与“他者”“异族”相对时中华民族的独立性与整体性，并且强调了“共同的民族意识”在维护中华民族的独立性与整体性中的关键作用，这也是本文所要阐明的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中华民族观围绕的主线思路。

① 郑大华.论抗战时期知识界的“中华民族”观念及其差异[J].中国文化研究,2023(3).

② 顾颉刚.中华民族是一个[J].益世报·边疆周刊,1939(09):1.

③ 黄兴涛.重塑中华:近代中国“中华民族”观念研究[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1.

④ 黄兴涛.重塑中华:近代中国“中华民族”观念研究[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4.

第二章 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中华民族观的理论来源

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中华民族观并非凭空产生,而是对中国古代民族观念、近代西方民族主义思潮以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民族理论批判继承、发展创新的理论成果。

第一节 中国古代“华夷一家”民族思想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各民族始终处于流动、交融、分合的动态变化之中,在民族格局的发展变迁中,民族意识也得到持续强化,从而形成了内涵丰富、具有中国特色的古代民族观念——夷夏观。中国古代先民笼统地将生活在中国及周围的民族划分为“华夏”与“夷狄”两大民族群体,一方面强调彼此间在文化上的区别,另一方面又始终强调相互依赖及不可或缺性。《诗经·小雅·北山》中的“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就表达了“华夏”与“夷狄”两大民族群体同属“王臣”的内在统一性。对此,汉代思想家贾谊说:“凡天子者,天下之首也。何也?上也。蛮夷者,天下之足也。何也?下也^①。”以天子为代表的华夏族与“蛮夷”虽被区分为“首”与“足”之别,但毕竟同属一身,不可彼此分离。后来,有些思想家甚至将“华夏”与“四夷”关系喻为阴阳关系,认为有夷必有夏、无夷则无夏。这说明中国古代民族观念可分为表里两层:从表层看,“华夏”与“夷狄”在礼仪、道德、服饰等方面有着明显区别,乃至存有“华贵夷贱”的民族歧视思想,但在深层里面看,“华夷一家”、“夷夏一体”思想是根本和主流。尤其随着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度的建立,这种思想不断被强化,如唐太宗便提出“夷狄一家”^②的观点,甚至打破传统尊卑界限,明确表示要“爱之如一。”^③最为典型的便是是雍正皇帝在《大义觉迷录》中提出的“天下一家”的民族思想。他强调“华夷”是历史范畴,在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发展中,早已实现了中外一体、华夷一家的政治局面。

纵观整个中华民族发展史可以发现,传统观念中关于华夷有别、华夷对立的认知,随着民族间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不断深入被逐渐淡化,而与之相对应

^① (汉)贾谊.贾谊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68.

^② 王溥.唐会要·北突厥条[M].北京:中华书局,2017:1690.

^③ 司马光.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2017:6236.

的夷夏一体、华夷一家的观念，因与中国古代推崇的大一统思想相契合，并蕴含了促进社会进步的内在动力，最终逐渐凝聚、沉淀、内化为各族儿女谋求长远发展的内在信念，在近代中华民族的发展走向中发挥了精神纽带的作用。在这种思想的长久浸润下，早期马克思主义者能够更加平等和包容的眼光看待中国境内的各民族，并推动各民族间平等、团结关系的形成，也让他们对于中华民族一体性的认识更加深刻。

第二节 近代西方民族主义思潮

鸦片战争以后，清政府逐渐沦为列强统治中国的工具，中华民族面临着亡国灭族的极大危机。正是在这种危机四伏的背景下，近代西方民族主义思潮被引入中国，进而催生了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崛起与发展，也推动了早期先进的知识分子与政治精英前赴后继地投入到救亡图存的运动中，他们的政治实践不仅唤醒了中国民众深层次的民族意识，加速了中国民族国家构建的步伐，也为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谋求中华民族独立与复兴的政治实践奠定了坚实的理论与实践基础。

其中，主权在民说和主权国家说是影响近代民族资产阶级建国思想的两股主流思潮。主权在民说以卢梭为代表，他提出天赋人权和社会契约论，强调国家主权属于人民，一切法律和执政者的行动都必须听从公意的裁决^①。主张以自由平等为理论基础建立现代民主国家，为反对专制统治开展民主革命运动的有志之士提供了思想指引。主权国家说代表人物有黑格尔、伯伦知理等人。黑格尔反对社会契约的建国学说，强调国家的整体性和统一性，个人应服从国家，并为国家独立、自由和荣誉作出牺牲^②。伯伦知理主张国家应该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国家就是一个民族力量的具体表现和人格化，具有最大最高的权力，这种权力，就是国家主权”^③。对于选择何种政体，伯伦知理虽称赞君主立宪，但也不反对共和政体，关键在于国家主权应以法律作为主要体现形式，而非君主个人意志或其他群体的意识所主导。因此他的国家学说广泛地为近代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和改良派所采用，革命派在解读伯伦知理学说时，重点在于将国家主权看作是法律层面的体现；

^① 卢梭.社会契约论[M].何兆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135-140.

^② 黑格尔.法哲学原理[M].范杨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259.

^③ J.K.Bluntsli, The Theory of the State[M].牛津英文版,1892:493.

而改良派则更倾向于将国家主权视为君主立宪制度^①。

梁启超于 1901 年在中国首次引入了民族主义的概念，并渐渐地将注意力转向了民族建国这一重要议题，“今日吾中国所最急者，……民族建国问题而已。”^②他受伯伦知理民族国家学说的影响，提出要抵御外来民族的侵害，关键是要养成具备民族国家国民品格和精神的“新民”。梁启超提出新民说的主要目的在于抵制平民发起的革命，为实行君主立宪制度提供理论依据。君主立宪之说固然不足取，但不可否认的是其蕴含了联合国内各民族共同抵御帝国主义侵袭的积极要素。^③早期革命派遵循西方民族主义以建立单一民族国家为目标的国家建构理念，主张推翻满族的封建专制统治，立志建立以汉族为主体的现代民族国家。虽然推翻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已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但是建立单一民族国家却不符合中国自古以来多民族的国家现实。真理越辩越明，正是在与立宪派的政治交锋中，以孙中山为主要代表的革命派放弃了他们最初提出的“驱逐鞑虏”、建立单一的汉民族国家的主张，而主张“五族共和”、“五族平等”，建立一个独立、民主、统一的多民族国家^④。虽然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封建专制统治，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民主共和国家，对于推进中国现代民族国家的构建进程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中华民国还不是一个主权独立、主权在民的现代民族国家，中国依旧处于严重的内忧外患的局面。然而，也正是得益于对早期民族资产阶级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经验、教训的总结与反思，使得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能够站在前人的肩膀上，更加清晰地认识到中国社会的特殊性和复杂性，他们没有被西方现成的民族建国理论和模式所束缚，而是紧密结合中国的历史传统和现实国情，勇于探索和创新，从而在此基础上开辟出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民族国家的建设道路。

第三节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民族理论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民族理论是以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以及斯大林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者对民族和民族问题的总的看法和基本观点，是一个内涵丰富且具

^① 夏良才.孙中山的国家观与欧洲“主权国家”学派[J].近代史究,1992,(05):79-95.

^②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 专集 4[M].北京:中华书局,1989:44.

^③ 吕昭义,李志农,吴彦勤.中国国家现代化历程与中华民族的觉醒[J].思想战线,2002,28(2):63-69.

^④ 郑大华.中国近代民族主义与中华民族自我意识的觉醒[J].民族研究,2013,(03):1-14+123.

有深远影响的理论体系。这一体系不仅揭示了民族问题的现象和本质，而且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制定民族纲领和民族政策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指导。俄国十月革命以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以及相关文献作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民族理论的载体传入中国，此后有关民族定义、民族形成与发展的规律、民族平等、民族自决等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思想精髓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对早期中国马克思主义者认识、解决中国的民族问题提供了基本的理论框架，也为其中华民族观的形成提供了宝贵的思想源泉。

一、 民族形成与发展的规律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民族并不是从来就有的，而是一个历史范畴，伴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社会分工和交往的扩大而产生，最终也会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消亡。据此，他们得出现存的所有制结构是导致某些民族剥削其他民族的根本原因^①，并强调唯有将其废除，方能从根本上消除民族间的剥削与压迫，而“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胜利同时就是一切被压迫民族获得解放的信号^②”，因此民族问题的最终解决便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应有之义。马克思恩格斯对民族形成以及发展规律的阐述，对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认识民族本质和规律、解决民族问题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参考和路径指引。遗憾的是，马克思与恩格斯却并未直接给“民族”下一个明确且统一的定义，仅提及了与民族形成紧密相关的多种要素。列宁虽然提出了包括地域、语言、心理特征以及生活条件在内的四个关键的民族特征，但他也并未给出民族这一概念的确切定义。直到1929年，斯大林才在《民族问题和列宁主义》一文中，将民族界定为“在历史上形成的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的民族文化特点上的共同心理素质这四个基本特征的稳定的共同体”。^③自此，第一个马克思主义民族定义正式成型。可以说，正是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民族定义的日益深化与拓展过程中，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逐渐形成了对“民族”这一概念的深刻且准确的认知。此外，列宁和斯大林还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的民族形成理论，提出民族这一概念是在资本主义兴起和发展阶段逐渐形成的历史范畴，列宁指出“民族是社会发展的资产阶级时代

^①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409.

^② 中共中央马克思 恩格斯 列宁 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287-288.

^③ 斯大林.斯大林选集:上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64.

的必然产物。”^①斯大林在《马克思主义与民族问题中》进一步表示,“封建制度消灭和资本主义发展的过程同时就是人们形成民族的过程。”^②这一结论对研究我国的民族形成问题具有极大的指导作用。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一结论主要针对的是西方现代民族形成发展过程,而没有真实地反映中国的民族形成道路。因为中国虽没有经历资本主义发展阶段,但民族自古就已经存在是不争的事实。这说明我们始终要以开放的、发展的态度看待马克思主义理论。因此,当我们研究马克思主义民族形成与发展理论并运用它来分析中国的民族情况时,必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从各个具体民族的形成过程中找出规律性的东西,从而使我们对民族形成问题有一个比较实际的、全面的、科学的认识。

二、 民族平等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认为民族平等是解决民族问题的关键,提出所有民族,不论其规模大小、强弱程度、历史长短或发展阶段的高低,均应当享有平等的地位。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提出“任何一个民族都永远不会优越于其他民族^③。”即强调所有民族在本质上都是无差别的、平等的。恩格斯也明确提出“任何民族当它还在压迫别的民族时,不能成为自由的民族^④。”列宁和斯大林在领导俄国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建立苏维埃政权以及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不仅继承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民族平等的思想,而且结合俄国的具体国情,进行了创造性的发展和实践。列宁将是否坚持各民族平等作为区分真假马克思主义者,甚至是真假民族主义者的分水岭。他不仅注重各民族形式上的平等,而且通过制定法律保障受压迫的民族达到事实上的平等。斯大林在领导苏维埃多民族国家的建设过程中,不仅对民族间事实上的不平等的根源给予了清晰的阐述,而且为消灭民族间不平等做了颇多有益的探索。中国早期马克思者在面对复杂的民族问题和历史遗留的民族矛盾时,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民族平等理论作为解决民族问题的基本原则之一并进行了创造性的运用和发展,探索出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

^① 中共中央马克思 恩格斯 列宁 斯大林著作编译局.列宁选集 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600.

^②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研究编.斯大林论民族问题[M].北京:民族出版社,1990:28-29.

^③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编.马克思恩格斯论民族问题[M].北京:民族出版社,1987:46-47.

^④ 中央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教研室编.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民族问题著作选[M].内部发行,1985:25.

的民族平等道路。

三、 民族自决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认为民族自决是被压迫民族实现民族平等联合的前提条件。19 世纪 60 年代马克思恩格斯就表达了各民族无产阶级团结和联合的前提必须是实现民族自决的观点。到了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列宁在看到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反抗帝国主义国家殖民侵略，争取独立的斗争浪潮后，鲜明地提出了“民族自决权”的革命口号。他将民族自决权解释为附属国及殖民统治下的被压迫民族，拥有完全脱离原有控制、建立独立国家的权利。通过各民族在平等原则上的团结联合，可以达成在全球范围内对被压迫民族的全面解放^①。列宁关于民族自决的理论阐释，为被压迫民族和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争取民族平等提供了有力的思想武器。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在民族自决权理论的启迪下，紧密结合中国的实际国情，创造性地构建了单一制的民主共和国，并在此基础上逐步发展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① 孙军.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早期进程研究（1921-1938）[D].北京:中央民族大学,2011.

第三章 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中华民族观的形成与发展

关于“中华民族”形成问题的探讨,国内学界早已硕果累累,目前比较权威的观点是费孝通先生提出的“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对抗中出现的,但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则是几千年的历史过程所形成的。”^①他从动态的角度客观地分析了中华民族的演化过程并且强调了在这一过程中“中华民族”由“自在实体”向“自觉实体”的现代性转变。黄兴涛在此基础上,提出“这样一种民族‘自觉’化的过程,无疑是一种全方位、多内涵的现代民族认同运动”,并从观念史的角度进一步说明“它首先表现为一种现代‘中华民族’观念或意识生成、强化的历史进程,也就是‘中华民族’观念从萌生到最终在全社会得以确立起来的过程。”^②而本文所探讨的早期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中华民族观正处于这种现代“中华民族”意识由萌发到确立的过程之中,因此深入了解并剖析早期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中华民族观的形成与发展,不仅能够揭示这一历史时期中华民族观念演变的内在逻辑,而且从中也能够深刻洞察中华民族共同体建构的理论依据与实践路径。

第一节 中华民族概念及演变

概念是理论的基础,概念内涵的演进总是隐含在历史发展的客观过程与政治制度建构的现实需要之中^③。早期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在建构现代民族国家,推进中国现代化的过程中,形成了对“中华民族”概念的不同认识,逐渐完成了从历史文化共同体到民族共同体,再到命运共同体的转变。

一、历史、文化共同体视角下的中华民族

杨度早年追随梁启超,坚定倡导君主立宪的救国主张,反对共和革命的道路。五四运动后,工农革命运动让他看见了中国的未来,在与李大钊等共产党人的接

^① 费孝通主编.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修订本)[M].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9:3.

^② 黄兴涛.现代“中华民族”观念形成的历史考察——兼论辛亥革命与中华民族认同之关系[J].浙江社会科学,2002(01).

^③ 孔亨.“中华民族”的概念内涵及其演变[J].湖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42(05):12-20.

触中，他的世界观也发生了根本转变，转而投身为一名共产主义者。杨度对于中华民族概念的界定虽难免梁启超的影响，但他突破了传统的基于血缘的族群概念，强调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属性，突出了其文化共同体的本质特征。在杨度发表的文章《金铁主义说》中，他频繁地运用了“中华民族”这一词汇，并且详尽地阐述了“中华”作为民族称谓的起源、特性，以及他个人对于民族辨识与认同的独到见解。杨度清醒地指出中国自古无民族一词，只有民族称号一说，认为“汉”实为刘家天子的朝号，不能算作该民族的族名。他进一步表示以地域区分国家乃得中国之名，以文化区分民族乃得中华之民族，明确将中华民族定性为文化民族。杨度在阐述“中华”作为一个文化族群的概念时，特别引用了《春秋》中的礼义来论证华夏的文化传统。他指出，国家的地位并非一成不变，中国若失去礼教，可以沦为夷狄；而夷狄若采纳礼教，亦可晋升为中国。这种评判的标准在于是否遵循礼教，而非血缘的亲疏。历经数千年的岁月，众多人种相互融合混杂，但“中华”的称呼依然沿用至今。由此可以推断，中华民族之所以被称为“华”，是基于其文化特质，而非血统。因此，依据“中华民族”的命名就可以推知其中的文化内涵。^①所以，杨度对中华民族名称的解释中也内在地包含了民族认同和识别的标准，即判断一个人是否属于中华民族，关键在于他是否认同并接纳“中华民族”的文化，而非单纯依据其是否拥有“中华民族”的血统。即便血统不同，但只要对中华文化有认同感，这样的人同样被视为“中华民族”的一员。

此外，杨度还十分看重文化认同在中华民族形成中的作用，提出“中国国民之全体中，分汉、满、蒙、回、藏五族”，但是文化程度不等，以“汉人为最高”，满人的语言和文字与汉族完全相同，因此他们的文化也几乎与汉族相当，并且远胜于蒙古、回族和藏族，但他认为随着全国教育与交通的兴起以及民族之间的交往加深，汉、满、蒙、回、藏五族将逐渐“混合”成为一个更加伟大且发达的“中华民族”。虽然“五族”未能包含中国境内的五十六个民族，但他对中华民族内涵的界定打破了传统的依据血缘关系亲疏的族类认同标准，并认识到“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是由多民族融合而成的文化共同体，已经初步具有了“中华民族”是中国境内汉、满、蒙、回、藏等各民族共同称谓的意识。^②

^① 刘晴波主编.杨度集[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90:374.

^② 郑大华.论杨度的“中华民族”观及其历史地位[J].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9,48(02),102-109.

杨度以“五族”界定中华民族的成员，是其最明显的弊端。李大钊在谋求统一的政治实践中意识到了这一点，指出“民国建立，号称五族，此实分裂之兆”。^①而对于如何举中华民族之力实现国家的统一，他结合自身的经验，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和主张：若中国想要实现国家的统一，就必须依赖于新民族主义。这种新民族主义是将汉族、满族、蒙古族、回族、藏族等各民族的精神融合在一起，从而形成一个新的中华民族。他解读“新中华民族主义”的同时也实现了对中华民族的概念界定。

他对于新中华民族主义所赋存的“新”中华民族，区别于时人或以“血统”或以“畛域”等旧有标准划分、界定的中华民族，提出“凡籍隶于中华民国之人，皆为新中华民族矣”。相较于以往单一民族论、以“五族”为代表的民族结构，更具包容性和现代性。这一方面基于他所持有的民族主义的理论，即同一种族的人之间存在天然的亲近感和相互联系的愿望，这种联系超越了国境和国籍的限制；另一方面源于他对于中华各民族共生共荣的历史与现实的分析，他指出我国历史悠久，亚洲诸多民族长久冶融便形成了中华民族，各民族之间早已畛域不分、血统消泯，所以诸如满人、汉人、蒙古人、回人、藏人，乃至苗人、瑶人等都是历史上遗留的称谓，如今各族之间交杂融汇早已没了明确的界限。再以“五族”指代中华民族不仅不切时宜，而且易造成分裂之兆。到1924年，他在北京大学政治学会演讲时，还进一步表示“不问政治、法律之统一与否，而只在相同的历史和文化之下生存的人民或国民，都可归之为一民族”，^②即认为民族应是历史、文化的共同体，摆脱了政治、法律的硬性约束，即便是当时隶属日本政府的台湾人民，他们在历史、文化上都与我国一脉相承，也不失为中华民族的一员。至此，李大钊对中华民族的认识摆脱了畛域、血统、种族、国籍、隶属的限制，强调中华民族是一个由中国各民族在历史进程中相互融合而成的历史、文化统一体，事实上涵盖了我国境内的全体国民。李大钊比较系统地提出了中华民族的概念并深刻阐释了其内涵和外延，他也因此被誉为具备现代中华民族观念的第一人，他对中华民族概念的阐述也为之后马克思主义者的中华民族观念的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① 中国李大钊研究会.李大钊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339.

^② 中国李大钊研究会.李大钊全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572.

二、 民族共同体视角下的中华民族

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为世界殖民地半殖民地弱小民族寻求民族独立与解放提供了基本的遵循。对此，瞿秋白在 1924 年发表的《十月革命与弱小民族》一文中便指出：“十月革命的结果，当然也不是霹雳一声地解决民族问题，不过是造成各民族真正自由结合的基础罢了。”^①即强调各民族在平等的基础上，自愿地团结在一起，形成一个紧密联系的整体。在此基础上，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开始以民族共同体的视角关注中华民族的发展走向，并在构建现代民族国家的过程中不断丰富发展中华民族的概念内涵。

瞿秋白可谓运用马列主义民族理论介绍无产阶级时代民族问题的第一人，他在《现代民族问题讲案》一文通过对民族的经济基础、民族运动的性质以及发展规律的分析，总结得出了民族的定义：“民族者乃因资本主义之发生及发展而形成之一种人类的结合，有内部的经济关系，即共同之地域以及共同之语言文化等者也。”^②他对民族概念的界定，揭示了民族的两个特点：第一，民族是在特定历史时期形成的一种人们共同体，由其内“种族之合并同化”而成；第二，民族基于人们共同体的社会物质结构之上的，故而民族在根本上是由社会的经济基础所决定的。

根据瞿秋白对民族的内涵及特征的解读，我们可以从狭义与广义两个层面理解其民族概念。狭义的民族即中国境内的各个民族，其本质是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人们共同体，如汉族、满族、回族等等。广义上的民族具体是指一定区域内的多个民族组成的民族共同体，比如中华民族、美利坚民族以及法兰西民族等等。在这个层面上，中华民族与美利坚民族、法兰西民族是具有同等政治权利的国家民族，在面对外来的侵害和侮辱时，可以举全国人民之力进行对抗，以谋求本民族的独立与解放。但是由于各民族在经济基础方面存在的差异，导致它们的民族力量各不相同。因此，不论是广义上的民族共同体，还是狭义上的具体民族，都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强大民族与弱小民族的差异。这种差异，实际上导致了强大民族对弱小民族的剥削和压迫现象。如狭义民族范畴中汉族和回族的对立，广义民族范畴中美利坚民族与中华民族的对立。而在瞿秋白看来，解决民族问题的关

^① 中共中央统战部.民族问题文献汇编[G].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63.

^② 瞿秋白.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489.

键在于处理好民族间的关系，因此他始终强调民族自由联合以对抗帝国主义，强调在中国境内，无论蒙古、西藏、满洲还是回民等各民族，都应以自由和平等的原则为基础，完全融入并参与到革命的中国建设中来。在国际舞台上，中华民族应自由“联合已得胜利的苏联各民族，合力彻底颠覆世界上一切帝国主义及其走狗”^①。瞿秋白始终认为要实现中华民族作为整体民族的独立，组建自由联合的民族共同体是必经之路，对内解放国内的弱小民族，将弱小民族与汉族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一致对外，对外实现与苏联各民族的联合，从而摆脱欧美日本等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与奴役，实现民族的独立与解放。

恽代英对于民族的看法，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观点颇为相似。他认为，民族是在经历了漫长的社会发展阶段后，基于多种共同要素和特征而形成的产物。在一个国家的领土内，可以存在多个民族，这些民族各自具有其独特性，简单地以国家主义观念或某一主导民族来替代或忽视其他民族的存在是不恰当的。我们应当充分尊重每一个民族的合法权益，确保这些民族不会受到任何形式的压迫，所以他始终主张“弱小民族联合的崛起自决”^②，使全体中华民族成为“联合作战的团体”，从而摆脱外族或不良的统治阶级的敲吸剥夺，最终求得中华民族的独立。

恽代英长期致力于革命宣传与教育工作，他始终极为重视探索和运用“中华民族”这一话语叙事方式。1923年11月，在《论三民主义》这篇文章中，恽代英对“中华民族”一词的频繁使用（共7次）充分展现了他对这一概念的高度重视。他通过论述汉族与中华民族的关系、各民族与中华民族的关系，明确传达出中华民族不等同与汉族，而是包含了汉族以及各少数民族在内的民族共同体。因此，革命价值和革命力量便有了恰中肯綮的理解：“我们……是为全体中华民族的利益而革命。所以革命……是全体中华民族所应做的。”^③指明了汉族与少数民族同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一份子，享有相同的权利，也承担着相应的义务，共同肩负着拯救民族危亡，共谋民族复兴的历史使命^④。此外，中华民族的概念还被赋予了国家内涵，体现为中华民族与国家的命运是紧密相连，不可分割的。在论述孙中山民族主义的革

① 中共中央统战部.民族问题文献汇编[G].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64.

② 恽代英.恽代英全集:第六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178.

③ 恽代英.恽代英全集:第五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167.

④ 恽代英.恽代英全集:第五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166.

命实践时，他就明确表示“中华民族一样的要反抗东西各国的宰割压制，”^①以期实现全中国的独立自由。因而在他的论述中，“全体中华民族”，“中华民族独立”，“全体中华民族的利益”的口号始终贯穿全文，很好的说明了中华民族作为国家民族在对外时的政治属性和利益代表。

总之，恽代英的中华民族概念，既具有民族共同体的基本属性，又具有国家民族的高级属性，是囊括汉族及各少数民族在内的一个总体称谓，以中华民族概念便可凝聚全国各族的力量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的独立。

三、 命运共同体视角下的中华民族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使中华民族陷入亡国灭种的危急关头，中国人民普遍意识到要战胜外来侵略者，实现国家独立与民族解放，就必须使各民族群众认识到中华民族命运相连的共同体属性，树立各民族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以此达到抗日战争伟大胜利的目标^②。在此基础上，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站在命运共同体的立场上对中华民族概念的理论阐释，为团结全民族抗战，争取民族独立，建立新中国发挥了不可小觑的作用。

杨松的中华民族观念正是在各民族对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自我认知觉醒的时代条件下形成的^③。杨松自1933年开始负责处理东北抗日问题，参与东北党的领导工作，为东北地区抗日联军的组建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做出了卓越贡献。得益于中国东北的抗战经历，杨松对中国的民族问题逐渐形成了自己的认识。1938年8月，杨松在《解放周刊》上连载《论民族》一文，系统地论述了其中华民族观。他也是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中第一个对“中华民族”概念进行理论阐述的人。杨松针对日本法西斯提出的“中国人是否是一个民族”的论调，从理论和实际上进行了坚决而有力的驳斥，同时阐发了他对“中华民族”的认识与理解。他首先从列宁主义的民族理念出发，指出民族是一个历史的范畴，“是随着封建主义的崩溃与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从各种不同的部落、氏族、种族、宗族等等”^④凝结

^① 韩颂刚. 瞿秋白民族革命思想研究[D]. 济南:山东大学, 2020.

^② 孟凡东, 闫奕澎. 命运共同体理念转型: 杨松中华民族观念及其新时代价值[J]. 黑龙江民族丛刊, 2024, (02): 45-54.

^③ 李贲, 孟凡东. 民族自觉、民族自为到民族复兴: 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逻辑演进[J]. 江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 (6).

^④ 中共中央统战部. 民族问题文献汇编[G]. 北京: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1: 763.

而成的近代民族。依据近代民族所普遍具备的四个特征：共通的语言、共有的地域、共同的经济生活以及共同的民族性(民族心理、民族精神)，杨松推断出中华民族是一个近代民族。但他同时也认识到中华民族形成为近代民族也有其特殊性，即所处的历史时代“不是处在资本主义上升的时代，而是处在资本主义的末落时代^①。”即便如此，中华民族的发展走向也必然遵循着全人类社会发展的共同规律，指向“中国民族解放与民族建国运动”。在此认识基础之上，杨松指出近代的中华民族的形成过程，和法兰西、意大利、英国等近代民族一样，是由不同的部落、种族等融合而成。其次，杨松从民族抗战的实际出发，指出在民族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中国人能够超越党派、阶级、年龄、籍贯等一切差异，实现民族内部的紧密团结，共同抵御日本侵略者的入侵，也足以证明中华民族是一个近代民族，在民族危亡时是团结一致、生死与共的命运共同体。因此，在面对日本帝国主义实行的挑拨离间、“以华制华”、“分而治之”的政策时，杨度提出只有中国境内的所有民族紧密团结，共同构筑起全面而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才能最大限度地激发全体国民对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的深刻认同，从而并肩作战将日本侵略者驱逐出境，捍卫我们共同的中华祖国。在此基础上，我们才能构建一个各民族自由联合、统一和谐的中华民主共和国。

1938年9月，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召开了六届六中全会。这次会议在党的“中华民族”观念的发展历程中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毛泽东作了《论新阶段》的重要报告，不仅频繁运用了“中华各族”的话语表述，而且明确指出“中华各族”是由汉族以及蒙古、回、藏、苗、瑶、夷、番等多个少数民族共同构成的。虽然毛泽东在报告中使用的是“中华各族”，但就其内涵而言，他所讲的“中华各族”是包括“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在内的中国全体民族的共同称谓，是一个高层的民族实体，实际上就是“中华民族”。1939年，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的第一章第一节便以“中华民族”为标题，详细阐述了他对于中华民族的认知与理解。他认为中华民族不仅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文化传统，而且中华各民族都一致崇尚自由反对压迫，暗含了中华各民族同气连枝、患难与共的情感认同。在这样的认知基础之上，毛泽东通过对中华民族内部成员和结构的分析，揭示了中华民族各兄弟成员休戚与共、不可分割的命运共同体属性。^②他也是早期

^① 中共中央统战部.民族问题文献汇编[G].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766.

^② 赵建利.毛泽东民族观研究[J].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2(01):77-83.

马克思主义者中对“中华民族”的整体性及其内在联系作出科学、完整阐述的第一人,在此基础上,中国共产党确立了“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中华民族是代表中国境内各民族之总称,四万万五千万人民是共同祖国的同胞,是生死存亡利害一致的”^①命运共同体理念。

1940年3月,贾拓夫以“关烽”的笔名发表了《团结中华各族争取抗战建国胜利》一文,文章开篇便指出:“中华民族是由中国境内汉、满、蒙、回、藏、维吾尔、苗、瑶、夷、番各个民族组成的一个总体^②。”因此,团结中华各族一致抗日,推翻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压迫和侵略,就必须认识到国内各族的共同利益,“在日寇侵略之下,国内各民族的命运是完全一致的,国内各民族如不团结抗日,则都将不免沦为日寇的牛马奴隶^③。”他强调在抗日战争这一特殊历史时期,国内各族是生死存亡、利害一致的命运共同体,只有认识到国内各族的共同利益,才能形成强大的民族凝聚力,共同抵御外敌的入侵。

正因为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们在建构现代民族国家的过程中不断丰富、拓展、深化中华民族概念,使得中华民族的属性逐渐实现了由历史文化共同体到民族共同体再到命运共同体的转变,不断加深了各民族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意识,并在革命斗争中进一步转化为强大的凝聚力和战斗力,促使中国共产党领导其麾下的人民武装在抗战的烽火中实现了由弱到强的历史性跨越。随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中国共产党的“中华民族”观念及其内涵也进一步固定化和制度化,且日益深入人心^④。

第二节 中华民族内部关系及结构

关于中华民族内部关系及结构的研究,学界一般视费孝通提出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为圭臬,认为中华民族是56个民族的多元形成的一体。具体而言:中华民族既是包括56个民族的民族实体,又是双层结构的民族复合体,“56个民族是基层,中华民族是高层”^⑤。在这56个民族中,汉族作为多元基层的一员,

^① 中共中央统战部.民族问题文献汇编[G].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808.

^② 中共中央统战部.民族问题文献汇编[G].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816.

^③ 中共中央统战部.民族问题文献汇编[G].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817.

^④ 郑大华.民主革命时期中共的“中华民族”观念[J].史学月刊,2014,(02):48-54+136.

^⑤ 于风政.论中华民族建设的主线与方向——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再思考[J].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36(03):10-16.

是起着凝聚作用的核心，是其中的主体民族。而对于“多元”与“一体”的关系，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的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作了精辟的论述。他说：“我们讲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一体包含多元，多元组成一体，一体离不开多元，多元也离不开一体，一体是主线和方向，多元是要素和动力，两者辩证统一。”^①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中华民族内部关系及结构的探讨也基本遵循这一路径，表现出了由浅入深的理论深化和实践探索过程。

一、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关系及结构的初步构想

杨度作为中华民族概念的早期使用者，将中华民族分为汉、满、蒙、回、藏五族，但是文化程度不等，以“汉人为最高”，满族人的文化发展水平与汉族几乎相当，蒙、回、藏族次之。虽然他认为各族发展程度虽然高低不一，但并不以此作为判定民族高低贵贱的标准，他以《春秋》礼义辩华夏的文化传统为佐证，表明了民族身份的动态性变化，内在地包含了民族平等的思想。他认为随着全国教育与交通的兴起以及民族之间的交往加深，五族将逐渐“混合”成为一个更加伟大且发达的“中华民族”，从而实现“五族合一”的民族新格局。这一预测不仅反映了他对中华民族多元属性的初步认识，更展现了他对于民族融合与一体化进程的积极期待。在他的观念中，虽然中华民族的多元属性是不可忽视的现实，但他更倾向于以一体来整合多元，旨在追求一种更为深刻和广泛的民族认同与团结，进而构建一个更加紧密且发达的中华民族共同体。而他认为要实现这一目标，必须要消除民族差异，实行国民统一之策：“首曰满、汉平等，次曰蒙、回同化。”因为他认为满族在文化上已被汉族所同化，只需解决二者政治上的不平等问题，即确保汉人的政治平等和满人的生计自由。一旦这些问题解决，满汉之间的界限将不复存在，形成深度融合，进而可以携手推进蒙古、回族的文化同化进程，并最终覆盖西藏。至此，国民统一的策略得以完善，各族人民在文化程度、能力和责任心上也达到均衡，五族合而为一，团结对外，从而构建一个强大而繁荣的经济与战争强国。从满汉平等到“五族一家”，杨度对“多元”与“一体”关系的认识随着“五族合一”的进程不断深化，强调在国民统一之下实现民族平等和文化融合。这些观点在当时具有一定的进步性和创新性，为推动国内民族关系的和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政治建设的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150.

谐与发展做出了贡献。然而,杨度在分析民族关系时,虽然意识到汉文化在中华文化中的核心与主体地位,希望以汉族的凝聚核心的作用促进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但他将中华民族的形成与发展过程等同于少数民族“汉化”或者被汉族同化的过程,无疑是尚未认识到中华民族的“多元”和“一体”的辩证统一关系。因此,尽管杨度提出了“五族合一”的宏伟蓝图,但他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理解却存在一定的偏差和局限性,过于强调一体性而忽视了多元性。

李大钊作为具有现代中华民族观念的第一人,对中华民族内部关系和结构也进行了初步的思考与阐述。他认为以“五族”指代中华民族不仅不切时宜,而且易造成分裂之兆,各民族之间早已畛域不分、血统消泯,所以满、汉、蒙、回、藏以及苗、瑶等各民族的传统称谓,如今已不再是划分彼此的界限^①,并进一步提出“凡籍隶于中华民国之人,皆为新中华民族矣^②”。相较于杨度提出的以“五族”为代表的民族结构,更具包容性和现代性。此外,他基于新民族主义思想,提出“合汉、满、蒙、回、藏熔成一个民族的精神而成新中华民族^③”,表达了中华民族是一个由多元民族融合而成的共同体。而对于新中华民族的建设路径,他认为“不外以汉人之文化,开发其他之民族^④”,并提议从蒙、回入手。这说明李大钊对新中华民族的认知也没有摆脱传统的“汉族中心论”,认为中华民族一体化或者民族融合就是“汉化”的过程,没有意识到民族融合是一个双向交流、碰撞、冲突的过程^⑤。到1924年,他在北京大学政治学会演讲时,明确指出民族的归属并非由政治或法律因素决定,而是根植于人们共同的历史经历和文化认同之中,即便是当时隶属日本政府的台湾人民,他们在历史、文化上都与我国一脉相承,也不失为中华民族的一员。李大钊将“相同的历史和文化”作为民族归属的判定标准,这与他早期强调以汉文化开发其他民族的观点可谓殊途同归,都认为推动中华民族一体化,就是推动少数民族“汉化”乃至泯灭少数民族文化,否认多元的民族文化,实际上将“多元”和“一体”对立起来,没有认识到二者的辩证统一关系。

① 中国李大钊研究会.李大钊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478-479.

② 中国李大钊研究会.李大钊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479.

③ 中国李大钊研究会.李大钊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339.

④ 中国李大钊研究会.李大钊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339.

⑤ 于风政.论中华民族建设的主线与方向——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再思考[J].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36(03):10-16.

二、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关系及结构的深入思考

恽代英基于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深入思考，分析了中华各族的关系和利益，不仅表明了中华民族内部成员的平等关系，还清晰地揭示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结构。在《苗族之文明》这篇文章中，恽代英有力地反驳了当时社会上那些受大汉族主义观念影响，从而轻视苗族人民的偏见。他指出，苗族在文化上，特别是在法律、宗教以及工业等多个领域，其发展水平并不逊色于汉族，而且在某些特定的方面，苗族甚至展现出了比汉族更为先进的特点。苗族之于汉族如此，其他民族亦如是，所以他十分认可孙中山对待各民族的态度，认为不仅应强调对外（即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平等，也同样要重视对内（即国内各民族）的平等。^①基于民族平等的立场，恽代英认为汉族与各少数民族应一致相待，避免各民族的关系走向两个极端，所以一方面要反对用汉族同化少数民族的观点，另一方面也要坚决遏止各少数民族走向分裂的倾向。^②对于当时国家主义者所提倡的汉族同化少数民族的观点，恽代英在《政治学概论》一文中坚决予以批判，他指出主张将满族、蒙古族、回族、藏族、苗族等少数民族逐渐融入汉族文化，并将蒙古、西藏等地区转变为与内地相同的行政区划，使这些地区的人民接受与内地相同的治理和统治方式。实质上是国家主义论者借大一统之说，行压迫弱小民族之实，^③这说明他已然认识到中华民族的一体化并不等于“汉化”或“一元化”，而是强调各民族在平等、尊重和理解的基础上实现和谐共存与发展。这与以往的“汉族中心论”和“民族同化论”有着根本的区别。因此，他郑重声明“我们全中国的国民，都是同气连枝的骨肉兄弟^④”，其中“同气连枝”表明了中华民族内部各族之间的紧密联系和共同根源，强调了中华民族的一体性，“骨肉兄弟”则指出了中华民族是由多民族组成的大家庭，彼此亲如兄弟，反映了中华民族的多元性。在此认识的基础上，他进一步阐发了有关革命的相关观点：“我们……是为全体中华民族的利益而革命。所以革命……是全体中华民族所应做的^⑤”，“以培养中华

① 恽代英.恽代英全集:第七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359.

② 谢泽栋.恽代英民族思想研究[D].北京:中央民族大学,2023.

③ 恽代英.恽代英全集:第八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183.

④ 恽代英.恽代英全集:第五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149.

⑤ 恽代英.恽代英全集:第五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167.

民族独立运动的实力，且注意融洽国内各民族的感情^①。”这一观点不仅表明中华民族在面对外来侵害，争取民族独立时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是囊括汉族以及各少数民族在内的民族共同体和利益共同体，而且进一步要求“融洽各民族的感情”，即是强调尊重各民族的差异性和多样性。恽代英以苗族为例，以事实反击大汉族主义者贬低少数民族的错误做法，为中华内部各民族的平等关系做出了有力的辩护和推动。虽然他在一定程度上认识到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关系及结构，但他的理解还比较零散，没有进行系统论述，也就没有实现“多元”和“一体”的有机结合。

瞿秋白始终站在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的立场上看待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关系及结构，强调在面对威胁与挑战时中华民族的整体性。因此，他提出抵御帝国主义和军阀压迫就必须让各民族在平等的基础上实行民族联合。即通过推动全国各民族间的平等与团结，从而联合各种小民族共同建立一个强大的中华民国。而国民革命，也正是站在全民众的立场上，坚决捍卫国家的独立和尊严，抵抗外国资本主义的干涉和剥削。^②这里瞿秋白首先表达了对中华民族内部各民族平等权利认可，其次以各民族联合而成中华民国的事实，对中华民族的多元构成和一体属性做了简明扼要地阐述，并进一步通过强调“全民众的国民革命”揭示中华民族在反抗外来侵略和压迫时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此外，他通过列举苏联境内各弱小民族联合而成苏联的事实，进一步论证了与苏联民族境况相似的中国，可以通过多元民族联合而实现民族国家构建的伟业，具体而言，“就是使中国境内蒙古、西藏、满洲、回回等民族，完全以自由、平等的原则加入革命的中国”。^③瞿秋白注重借鉴苏联建国的经验，始终强调通过各民族的平等联合，实现中华民族的一体化，最终消除外部压迫建立独立的民族国家。瞿秋白在强调民族独立与自由联合的过程中，展现了对多元价值意义的深刻洞察。他认识到，每个民族都有其独特的文化和历史背景，享有平等的权利和尊严，这是多元一体格局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但他可能过于强调了各民族之间的平等与自由，而忽视了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各民族之间所形成的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紧密关系。这种关系不仅仅是政治或经济上的联合，更是文化、情感和社会结构上的深度融合。这种

^① 恽代英.恽代英全集:第五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98.

^② 瞿秋白.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387.

^③ 瞿秋白.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409.

忽视可能导致对中华民族一体性的认知变得机械和片面。因此,在理解和阐述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时,我们需要更加全面和深入地探讨各民族之间的内在联系和相互依存关系,以形成更加准确和完整的认知。

三、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关系及结构的全面认知

杨松站在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立场上比较全面地阐述了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关系和结构。他阐述道,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近代形成的民族,是由众多的部落、种族等融合而成的。就国内而言,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成员涵盖了汉人、满人、回族人(汉回人)、土著番人(汉番人)、已经汉化的苗族人(熟苗人)、已经汉化的黎族人(熟黎人)以及部分蒙古族人(如土默特蒙古人)等等^①,强调了中华民族的多元属性。不仅如此,“中华民族”的核心成员“汉人”,其构成也并非基于单一的血缘关系,而是融合了华夏、南蛮、东夷、百越等拥有不同血统的部落、种族群体。尤其是那些在历史进程中已被深度同化的满、回、番、苗、蒙古、黎等族群,他们在经济模式、语言交流、风俗习惯以及日常生活方面,与汉人之间的界限已变得模糊不清,形成了深度的共生关系。尽管他们在某些传统习俗和日常生活细节上仍保留着与汉人细微的差异,但这些族群既不再完全保持其原有的种族特性,也无法简单地被归为汉人范畴,而是共同汇聚成了一个新的近代民族实体,即我们今日所称的“中华民族”。说明杨松已然认识到中华民族从多元到一体的过程,就是以不断充实、改造和扩大汉族为主要途径,通过凝聚、壮大和夯实中华民族的实体部分,使之最终成为一个具有完整特征民族实体^②。但他将汉族及汉化群体等同于中华民族确是值得商榷的。虽然杨松提出中华民族是一个近代民族,但有别于美利坚民族、法兰西民族的单一民族国家性质,他明确指出“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这一表述清晰地揭示了中华民族内部多元而又统一的结构特征。

杨松对于“中华民族”的理解具有相当的深度和细致性。他认识到中华民族并非简单地将国内所有民族归为一个共同称谓,而是特指汉人及被汉化的文化群体,这些群体与国内的其他少数民族共同构成了中国的多元一体民族结构。但他

^① 中共中央统战部.民族问题文献汇编[G].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766.

^② 于风政.论中华民族建设的主线与方向——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再思考[J].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36(03):10-16.

囿于具体的族群划分标准，始终站在大汉族主义的立场上规划中国的民族结构，虽然意识到汉族及汉文化的核心和主体地位，但忽视了汉族虽然只是中华民族多元基层中的一员，而将汉族及汉化群体等同于高层的中华民族，不得不说是一种遗憾。尽管杨松在理解中华民族结构时存在一定的局限，但他的见解仍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毛泽东在此基础上阐发了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深刻理解，为中国的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做出了重要贡献。

毛泽东在参与和领导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中，逐渐形成了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关系和结构的全面系统的认知。在 1938 年召开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发表了题为《论新阶段》的重要讲话，其中明确指出，“中华民族”这一大家庭是由汉族以及蒙古、回、藏、苗、瑶、夷、番等众多少数民族共同组成的，对中华民族的多元结构已经有了较为清晰的表述。1939 年，毛泽东在其文章《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开篇章节，直接以“中华民族”为标题，详细阐述了他对中华民族在悠久的历史中形成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多元一体关系和格局的全面认知。他按照历史叙事逻辑，首先指出了“从很早的古代起，我们中华民族的祖先就劳动、生息、繁殖在这块广大的土地之上^①，”通过这一事实深刻地表明了中华民族同根同源、血脉相连的历史渊源。接着，他深入剖析了中华民族的现实状况，明确指出，中华民族“四亿五千万人口中，十分之九以上为汉人。此外，还有蒙人、回人、藏人、维吾尔人、苗人、彝人、壮人、仲家人、朝鲜人等，共有数十种少数民族，虽然文化发展的程度不同，但是都有长久的历史^②，”由此得出结论：“中国是一个由多民族结合而成的拥有广大人口的国家^③”。这是毛泽东基于马克思主义的民族理论视角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对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进行深入分析后所得出的理性判断和深刻认识。不仅揭示了汉族作为中华民族主体民族的事实，而且“结合”一词清晰地阐明了各个民族在不断地交流与融合过程中形成了一个紧密相连、不可分割的整体，即中华民族。这种“结合”，并非简单的物理堆砌或机械组合，而是一种文化、经济、社会乃至心理上的深度融合，可以说精确地概括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本质特征。最后，他通过描述中华各族人民自古以来都反抗外来民族的压迫的事实，

①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 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621.

②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 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622.

③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 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622.

总结得出中华民族不仅拥有辉煌的革命传统，还承袭了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这一论断不仅彰显了中华民族的坚韧不拔和英勇抗争精神，也强调了历史在塑造民族认同和凝聚民族力量中的重要作用。毛泽东认为正是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特别是在共同的革命斗争中，中华民族各族人民逐步融为一体，形成了今天这个多元而又统一的伟大民族。此外，毛泽东在审视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关系时，始终坚决反对大汉族主义的立场。他认为汉族虽然是中华民族的主体民族，在历史上对少数民族的发展提供了诸多帮助，但这并不意味着汉族可以凌驾于其他民族之上，必须要充分认识到“少数民族在政治上、经济上、国防上，都对整个国家、整个中华民族有很大的帮助^①”，“没有少数民族是不行的”。基于上述直接而透彻的分析，使得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相互依存、不可分割的关系格局得到了充分彰显，并在全党乃至全国范围内赢得了广泛的认同，进一步巩固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关系和格局。

第三节 中华民族复兴路径探索

一、从“五族合一”到民族大团结

民族建国是近代中国的一个重要历史主题，它深刻关联着国家的统一、民族的团结以及社会的和谐。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不仅承接了这一历史重任，还在建立新中国的实践探索中，经历了从以“五族”为主体到涵盖全体中华民族的国家框架建构的转型。

“五族合一”是杨度构建现代民族国家的核心理路。他所谓的“五族”，具体指的是汉、满、蒙、回、藏这五个民族。杨度试图通过实施同化政策，将“五族”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实现“合五族为一家”的愿景，从而构建一个团结、统一的现代民族国家。但他通过对各族发展程度的分析得出，五族之中，唯有汉族已经进入了国家社会，具备了国民的完整资格。相比之下，满族、蒙古族、回族和藏族这四个民族，仍处于宗法社会阶段，他们或是以游牧为生，或是从事农耕，在国民资格的完备性上尚有所欠缺，使得这四个民族的民族意识较为强烈，而国家意识相对淡薄。因此，他们往往被视作种人、族人，而非具有广泛国家认同感的国民。从现实情况分析来看，五族间差异显著，要实现“五族合一”的美好愿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文集 第六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210.

景并非易事。即便如此，杨度始终反对“五族分立”之说，他认为中国的领土，是由汉族、满族、蒙古族、回族、藏族这五个民族的土地共同构成的；当今中国的人民，也是由这五个民族的人民汇聚而成的，他们共同置身于同一个统治权之下，从而组成了一个统一的国家，明确表达了合“五族”乃成一国的观点。此外，杨度也大胆设想了五族分立的后果：由于组建国家必须具备人民、土地和主权，而五族之中只有汉族具备立国之资格；满族分散于全国各地，没有土地可分，“不能独成一国”；蒙古族、回族、藏族无法组建能与外邻抗衡的强大国家。在这种情况下强行分立，蒙古族和回族可能会落入俄罗斯的控制，藏族可能会被英国占据，满族地区可能被日本占领，黄河流域或许会被德国控制，云南、贵州以及两广地区可能归法国所有，长江流域可能被英国控制，河北一带可能落入俄罗斯之手。这样分裂出去的四个国家会同时灭亡，也就意味着整个中国将面临消亡的命运。^①所以杨度斩钉截铁地说“国民之汉、满、蒙、回、藏五族，但可合五为一，而不可分一为五”，正是因为他明确地意识到“五族分立说，乃亡国之政策，决不可行者也。”在此基础上，杨度对“五族合一”的实现路径也做了明确说明，他认为要想各族“合同一致”，共同致力于国家繁荣，必须实行国民统一之策：“首曰满、汉平等，次曰蒙、回同化，”只有当满汉之间的界限完全融合，我们才能集合满汉两族的力量，共同推进蒙古族和回族的同化工作，并进一步将这一进程扩展到西藏地区。杨度希望通过一系列精心设计的步骤，促进不同民族之间的深度融合，只有这样，国民的整体素质才会趋于一致，能力相当，责任心也相当，五个民族才能真正融合成一家人，齐心协力对外发展，充分地发挥广袤土地和众多人口的优势，从而在世界上树立一个强大而宏伟的经济与军事强国形象。在杨度的构想中，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通过“五族合一”构建强大的民族国家最终雄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李大钊早期也在“五族”的意义上规划民族关系，构建统一的国家，如1918年他在《雪地冰天两少年》便提出中华民族想要构建一个统一的国家，必须建立在新民族主义基础之上，合汉、满、蒙、回、藏等五族的精神熔铸而成一个新中华民族。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和革命形势的发展，他开始以更加包容的视角看待中华民族的崛起之路。1924年1月，他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

^① 刘晴波主编.杨度集[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90:303.

时指出,要想摆脱帝国主义及封建军阀的压迫,“非依全国国民即全民族的力量去做国民革命运动不可^①。”这就将民族振兴的希望寄托于全民族的团结。在李大钊的引领下,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不断强调通过民族团结、联合以推进中华民族复兴的大业。如瞿秋白便呼吁中国社会各个阶层加强团结合作,携手构建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汇聚全民族的力量,共同肩负起实现民族解放的崇高使命。杨松也高度重视民族团结,认为如果没有中华民族内部的精诚团结,中国就难以避免亡国灭种的危机,“对异族侵略者和平妥协,屈服投降,缺乏民族团结,则必然亡国。反转来说:民族团结,去一致抵抗侵略者,则可避免亡国,或是由殖民地而变为独立国。”因此,他主张中国各民族亲密联合,建立起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把日寇逐出中国,“才能建立独立的统一的各民族自由联合的新式中华民国。”^②毛泽东认为要让中华民族“走上独立、自由、和平、统一和强盛的道路”,^③必须要团结一切反对帝国主义、坚持爱国立场的民族。在此基础上,打败敌人,顺利完成民族民主革命的任务。除此之外,各民族也将在政治、经济、文化等一切方面实现全面的发展和进步,从而共同建设我们伟大的祖国。可见,全民族团结的口号在推进中华民族独立,建设新的国家政权的革命实践中逐渐成为了一股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这一口号凝聚了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心愿与力量,在这股团结力量的推动下,中华民族成功推翻了长久以来的封建主义束缚,粉碎了帝国主义的侵略阴谋,建立了独立统一的新中国政权,实现了各族人民共同当家做主的美好愿景。

二、从国民性改造到培育中华民族精神

辛亥革命后不久,袁世凯便窃取了革命果实复辟帝制,实行独裁统治,致使共和名存实亡。国人开始深刻反思造成这一结果的深层原因。此时恰逢西方的进化论、社会有机体说传入中国,在宣传、普及的过程中人们逐渐认识到恰如生物有机体的性质、强弱取决于细胞的属性一样^④,国家的强弱兴衰也取决于国民素质,“民质而优则其国必昌,民质而劣则其国必亡”。由此,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将国

^① 中国李大钊研究会.李大钊全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505.

^② 中共中央统战部.民族问题文献汇编[G].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795.

^③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 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464.

^④ 郭汉民,袁洪亮.近代中国国民性改造思潮简论[J].广东社会科学,2000,(06):93-97.

家的积弱归结于国民素质的低下，并进一步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国民性研究的社会热潮，人们认为只有克服国民劣根性，才能救亡图存。1915年新文化运动兴起后，要求改造国民性的呼声更高，到五四时期达到高潮。李大钊、陈独秀作为新文化运动的先驱，非常重视国民性改造。在李大钊看来，洪宪帝制不完全是个人的罪过，而是国民心理的一种反映，根在“吾人自己之神脑”^①。陈独秀进一步指出只有国民精神上的觉醒，中华民族才有复兴的希望，“欲图根本之救亡，所需乎国民性质行为之改善”^②。可以说，国民性改造就是他们所倡导的“再造中华”的核心要义。

他们认为要想改造国民性，首要之务无疑是梳理并揭露当时中国人身上存在的种种“劣根性”。陈独秀在《我之爱国主义》一文中借用外国人的评价，认为国民存在贪财好利、污秽不堪、身体羸弱、营私舞弊等痼疾，还有“官吏国”、“黄金崇拜”、“工于诈伪”、“不服权力不服公理”、“放纵卑劣”等现状。李大钊同样指出了国民性格中根深蒂固的“皇权”思想、“官本位”思想、“好同恶异”心理、“奢靡”、“虚伪”风气以及“尚情不尚理，任力不任法”的处事方式，并在《论民权之旁落》一文中分析了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在于国民廉洁羞耻之心日渐丧失，正义观念逐渐消失，因此导致了他们性格中卑劣、无耻、怯懦、苟且偷安、狡诈善变、圆滑世故的特点。虽然中国人的弱点有诸多表现，但最根本的则是奴隶性，且普遍存在于中国社会各阶级、阶层之中，从根源上来说，是长期的封建专制制度造成的。因此只有进行彻底的社会革命才能摧毁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实现中国社会制度和整个社会生产方式的真正变革。然而，他们在实际运动中却片面遵循社会有机体说宣扬的个体之性决定群之性的逻辑，片面强调个体的自我改造与完善。认为只有在广大民众的整体素质得到普遍提升之后，中国才能实现真正的民主与富强。

陈独秀、李大钊把彻底改造国民性的重托寄予中国青年，他们认为青年“有江流不转之精神，屹然独立之气魄”，“此之精神，即生死肉骨，回天再造之精神也。此之气魄，即慷慨悲壮、拔山盖世之气魄也”，^③所以李大钊曾信誓旦旦地

^① 郑师渠.辛亥革命后关于国民性问题的探讨[J].天津社会科学,1988,(06):39-45+25.

^② 任建树.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一卷[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204.

^③ 中国李大钊研究会.李大钊全集 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309.

宣扬：“青年不死，即中华不亡”。^①陈独秀在《新青年》开宗明义即宣告：“本志之作，盖欲与青年诸君商榷所以修身立国之道”。至于如何培养这样的新青年，他们都认为根本途径在于教育。陈独秀在《今日之教育方针》一文中指出青年的教育应使他们了解人生之真相，国家之意义，个人与社会经济之关系以及未来责任之艰巨^②。”李大钊则认为必须加强对青年人生观、价值观的教育，促进他们思想的觉醒。真正有血气、有理想、有精神的青年，应该以积极进取、不畏牺牲的人生态度以及创造青春中华的高尚理想而奋斗终身。^③然而他们的国民性改造仅仅停留在文化心理结构的层次上，没能找到影响中国“社会发展的更深刻的原因”，即社会经济基础，这导致他们的国民性改造计划最终流于空谈，未能完成铸造新的国民性这一历史责任。

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这一历史性事件不仅为中国革命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指导，也极大地改变了中国革命和中国人民的精神面貌。尤其是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中国人民就从精神上由被动转为主动^④”。中国共产党在斗争中认识到，几千年封建制度对民众的思想桎梏并没有随着封建王朝的倒台而消失，国民思想中的奴隶性依旧根深蒂固，因此要想激发人民群众的爱国热情与革命斗志，中华民族亟须找到变革制度、解放思想的强大力量。在此认识基础上，中国共产党始终矢志不渝地弘扬与培育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革命精神，通过中华民族的精神重塑，不仅推动了广大人民的思想觉醒和精神独立，更在全社会凝聚起了民族复兴的强大精神力量。

恽代英深刻认识到民族精神的价值，认为中国之所以能够存续至今，并非依赖于外国势力间的均衡，而是完全仰仗于我们自身独特的民族精神，他将其解释为“反抗异族的精神”，并以高瞻远瞩的眼光预示道：中华民族特有的民族精神是国家的希望所在，是维持国家存续的关键，也是未来挽救国家危亡、振兴国家的核心力量^⑤，即内在传达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革命精神对于中华民族的极端重要性，甚至将民族精神的提升与中华民族复兴进程紧密耦合。他在《前途的乐观》一文中明确写道：“过去的一年中间，显然可见的，便是国民精神已经不是像

^① 中国李大钊研究会.李大钊全集 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329.

^② 任建树.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一卷[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171.

^③ 中国李大钊研究会.李大钊全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425.

^④ 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10-11.

^⑤ 恽代英.恽代英全集:第六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358.

从前那样散漫昏沉。这种国民精神的进步，明明是中国复兴的佳兆。”^①恽代英不仅清醒地揭示了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性，而且理性地分析了当时民族精神衰弱的原因。他认为国民爱国观念薄弱主要原因在于外资压迫。在他看来，民族精神的强盛，不仅是中华民族赢得独立的必然产物，更是推动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重要途径。鉴于此，他针对性地提出了培育民族精神的具体措施。首要任务是抵制外国文化的侵略，并积极推广富含民族特性的教育方针。在少年中国学会苏州大会的宣言中，恽代英强调应“提倡民族性的教育，以培养爱国家保种族的精神。反对丧失民族性的教会教育，及近于侵略的文化政策。”^②其核心在于，通过教育的途径来强化民众的国家认同感和民族情感，从而树立为中华民族独立自强而不懈奋斗的坚定信念。其次，打破对欧美国家的盲目崇拜。针对智识阶级自认本民族文化低于欧美，便认为西方文明优越于中华文明，西方国民文明于中国国民的妄自菲薄之语，恽代英犀利辩驳道：“所谓欧西文明国民，我虽接触得不多，然而以目所见，耳所闻，书籍所记载，看起来，下层阶级，一样同中国人是卑污猥琐”。^③通过揭露欧美社会的弊端，打破国民对于西方文明的盲目崇拜，从而重振民族自信心。最后，通过经济物质的发展来增强和振奋民族精神。恽代英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指出经济问题，即生活的基本需求问题，对人的生存状态和心理状态有着极其深远的影响，进而推断出当今中国精神层面的萎靡不振，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物质条件的匮乏所导致的。因此，必须大力发展经济以破除欧美的经济压迫，以民族经济的独立提携中华民族的精神。此外，他通过论证了经济上的压迫是国民道德衰败的根源所在，并以此为依据，反驳了中华民族是劣等民族的说法。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民族的自尊心与自信心，增强了国民的爱国主义情感，为凝聚全体人民反抗外部压迫，争取革命斗争的胜利提供了必要的精神支撑。

毛泽东也十分重视培育和发扬民族精神。1929年，毛泽东在写给中央的建议信中便提出依靠“积极精神”恢复和壮大共产党的战斗力，意在发扬自为的革命精神，唤醒全党的革命情绪，促进革命持续发展。1938年，毛泽东进一步强调，要想圆满完成革命任务，建立起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中国，就必须“发扬艰苦

^① 恽代英.恽代英全集:第六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22.

^② 恽代英.恽代英全集:第五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98.

^③ 恽代英.恽代英全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120.

奋斗、不屈不挠、再接再厉的革命精神^①”。正是在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革命精神的激励与导向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得以广泛树立，它汇聚民心于民族独立与解放的共同目标之下，集结力量于中国共产党引领的人民武装斗争及抗日救亡的宏伟事业中，最大程度地联合了广大人民群众，由此坚定了中国人民追求自由解放与民族复兴的必胜信念，开启了中华民族凤凰涅槃、浴火重生的新征程^②。

三、从民族自决到民族自治

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的民族自决权思想以及俄国根据这一理论实行的联邦制度，被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所了解并运用到中华民族建国的实践中，这一时期，他们往往将国内少数民族自决等同于“同中国脱离、自己成立独立的国家”，并在此基础上平等联合而成联邦制国家。至20世纪20年代初，全球范围内民族自决的浪潮迅速兴起，中国也随之兴起了一场规模宏大的“联省自治”运动，其核心主张是在各个省份实现自治的前提下，构建一个统一的联邦制国家政权。^③

李大钊是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中较早提出民族自决思想的先驱。他在1920年发表的《联治主义与世界组织》一文便宣称“现在的时代是解放的时代，现在的文明是解放的文明”，其中“解放”的内涵就包括了“殖民地对于本国要求解放，弱小民族对于强大民族要求解放”^④，即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弱小民族”对于帝国主义的自决，结合中国彼时的国情就是中华民族对于日本帝国主义的自决。此外，李大钊基于“现在的世界已是联邦的世界，将来的联邦必是世界的联邦”的预见，结合当时中国的具体国情，指出自中国实行共和制以来，国内存在严重的政治分裂和地域不服从现象，特别是边疆地区对于中央政权的认同感不强，要求更大的自治权或独立地位，因此他坚决断定“非行联治主义，不能改造一个新中国。”^⑤他认识到各民族既有自己的个性，也有相同的共性，既要保障他们个性自由，不受侵犯，又要让他们结成平等的组织，实现互助，只有将联邦与自治紧密结合在一起，才能实现个性与共性的高度统一。他认为联治主义恰好是一种适合复杂、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文集 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112.

^② 肖银洁,吕宏山.中国共产党培育与弘扬中国精神的百年历程与经验[J].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2023,(01):183-199.

^③ 张纯,侯典举.从联邦制的民族自决走向单一制的民族区域自治——中国共产党对民族政策的探索之路[J].黑龙江民族丛刊,2016,(06):19-25.

^④ 中国李大钊研究会.李大钊全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395.

^⑤ 中国李大钊研究会.李大钊全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398.

多元、差异性生活关系的新组织形式，它能够化解因感情、性格、语言、宗教等因素导致的国家民族间的纷争，消除旧有的仇怨嫌憎，实现和平共处与团结统一。李大钊提出的联治主义思想，其核心出发点在于反对民族压迫，旨在实现各民族之间的平等、团结与互助。他倡导各民族人民应联合起来，共同当家作主，参与国家的建设。

瞿秋白也提出“中国内部的民族问题，只有汉族采取绝对自由的民族自决的原则，才能解决”。^①他特别以蒙古为例，强调在国民革命中应联合各方力量，共同反对军阀的压迫，并在一定程度上支持外蒙古探索独立自主的道路。待国民革命成功后，汉族与蒙古族等应基于自由和平等的原则，共同构建一个统一的共和国。^②这与列宁主义所倡导的“民族自决直到分立国家”的民族国家建构理念是一脉相承的。他甚至认为“如果蒙、藏民族自己要坚持联邦制度，中国国民革命的政党，都可以让步”，^③瞿秋白意识到只有承认这些弱小民族的完全自决权，才能让他们倾心于革命的中国，进而团结起来共同抵御国内军阀以及国外的欧美日本帝国主义的压迫，使得中华民族的独立与解放其取得整体性的胜利。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为了粉碎日本帝国主义打着“民族自决”和“民族独立”的旗号分裂中国的企图，同时团结一切力量壮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党的民族政策也相应调整，主张联邦制下“民族自决”与“民族自治”并举。

杨松依据马克思主义的民族理论的相关论述，并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对“民族自决权”这一概念进行了深入的解读。他认为，对于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被压迫民族而言，这一权利意味着他们有权自主决定本民族的未来命运，甚至有权选择脱离原有的民族集体，建立属于自己的独立国家。然而，这一权利的具体实施，还需根据各民族所处的特定历史背景、经济状况以及政治条件来综合考量。在此基础上，他进一步强调“马列主义者提倡民族自决，并不是等于提倡民族的分散，建立许多小国家。”^④他论述道，马列主义者之所以提倡民族自决权，正是因为各民族只有经过自由分离，才能走向各民族间自愿的、自由的联合，进而才能产生各民族间的相互信任与友爱，从而建立起联邦式的统一的民主集中制的多民族国

^① 瞿秋白.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475.

^② 瞿秋白.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490.

^③ 瞿秋白.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475.

^④ 中共中央统战部.民族问题文献汇编[G].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769.

家。虽然他强调各民族在自由分离基础上实现自愿联合，甚至将未来国家的政权组织形式描述为“联邦式”的，但是不同于中国部分马克思主义者对苏联民族国家构建模式的生搬硬套和民族自决理论的机械运用，他结合中国自古以来便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历史传统，明确表示我国同胞争取中华民族自决权的斗争，是为了“中华民国的领土完整及行政主权统一”，从而建立一个“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①。这与他上文所希冀建立的“统一的民主集中制的多民族国家”有异曲同工之意，均强调政权的统一、集中。总而言之，杨松所主张民族自决，既包含了中华民族对于外国帝国主义的自决，也涵盖了中国境内被压迫民族对压迫民族的自决，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对于第二点内涵的理解，他更加强调各民族以平等、自由形式结成自愿联合，但不主张民族完全自治甚至建立自己的独立国家，基于对中华民族历史传统和民族利益的总体考量，他倡导建立一个政权高度统一且各民族自由联合的新中国。此外，他对民族自决和民族自治的关系也做了一个明确的说明，他虽不主张民族的完全自决，但“承认地方的民族自治是解决民族问题的形式之一”，马列主义者对此也是持赞同和拥护的态度的。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民族自决权并不等同于地方的民族自治权，正如前文所说，民族自决包括对外与对内两个方面，而地方的民族自治只是对内民族自决的实现途径之一。

杨松在探讨“民族自决权”的议题时，不仅牢固坚守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该权利的基本理论框架，还深入结合了中国实际国情进行了全面考量。他对民族自决权的内涵进行了透彻而深刻的剖析与阐释，并对于民族自决是否必然导致建立独立的民族国家这一问题给出了独到的见解。同时，他也探讨了民族自决与民族自治之间的内在联系。这些论述为党加深对国内少数民族民族自决权的新认识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使得党能够更加准确地理解和运用这一原则，以更好地指导中国的民族工作。

1938年10月，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作《论新阶段》的报告，提出：“允许蒙、回、藏、苗、瑶、夷、番各民族与汉族有平等的权利，在共同对日的原则之下，有自己管理自己事务之权，同时与汉族联合建立统一的国家^②。”他以“有自己管理自己事务之权”代替了“民族自决”的标语，这一论述也充分说明我们党虽然认同民族自决权的原则，但在当前抗日战争的背景下，并不支持回族或其

^① 中共中央统战部.民族问题文献汇编[G].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801.

^② 中共中央统战部.民族问题文献汇编[G].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595.

他任何的民族实行自决乃至分立，因为这有可能会助长日本帝国主义的势力。相反，应该基于民族平等的原则，联合中国所有民族共同抗日，并推动实现民族的自治。中国共产党在坚持国家统一的前提下，初步提出了关于民族区域自治的理念。这标志着民族区域自治思想的萌芽。并且随着 1941 年《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的发布以及基层民族自治政权的相继建立，也标志着民族区域自治由理论走向实践。

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曾探索过“联邦制下的民族自治”这一模式，并在随后的解放战争时期进行了更为深入的实践。这一时期的探索与实践，为后来放弃“联邦制”并转而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随着解放战争的顺利推进，中国共产党成功推翻了国民党政权，完成了从地方性执政向全国性执政的历史性跨越。在这一至关重要的转折点，党承担着构建新政体和建设新国家的重大使命，首要考虑的问题便是新中国的国家结构形式，即选择联邦制还是单一制。毛泽东在起草《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时，率先引发了关于这一问题的深入讨论，提出了是否采用联邦制，或是建立统一的民主共和国并推行少数民族区域自治的议题。当时担任中央统战部部长的李维汉明确指出，中国与苏联在国情上存在显著差异，不宜实行联邦制，他认为应该“在各民族一切权利完全平等的基础上，建立各民族人民自愿联合的统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实行民族区域自治^①。”党中央和毛泽东认同并采纳了这个建议。1949 年 9 月，周恩来作《关于人民政协的几个问题》的报告，也明确指出：“我们国家的名称，叫中华人民共和国，而不叫联邦^②。”自此，联邦制的民族自决彻底告别中国政治舞台，单一制下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被写入《共同纲领》和历次宪法之中，成为中国解决民族问题的重要制度设计^③。

① 李维汉.统一战线问题与民族问题[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722.

② 中共中央统战部.民族问题文献汇编[G].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1267.

③ 张红,郑信哲.李维汉对中国共产党民族工作的重要贡献及其启示[J].贵州民族研究,2022,43(02):7-13.

第四章 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中华民族观的特征

第一节 对中国共产党初心使命的坚持

中国共产党一经成立，便自觉肩负起救亡图存的历史重任，矢志不渝地将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与使命。在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中华民族观念的发展演变的历程中，他们也始终以救亡图存为核心追求，将民族复兴视为宏伟蓝图，深入实践，勇于开拓，致力于寻找一条符合中国国情、能够引领民族独立与解放的革命道路。

一、以民族复兴为伟大梦想

“民族复兴”的话语，作为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历史进程中的重要思想脉络，是在中华民族面临深重危机、内外交困的复杂背景下逐渐形成并深化发展的。这一过程不仅是对国家命运的深刻反思，也是民族自我意识觉醒与集体行动力的集中体现。在这一背景下，一批有识之士开始寻求救亡图存的道路，从洋务运动到戊戌变法，再到辛亥革命，都是对民族复兴的初步探索。这些尝试虽然未能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的命运，但激发了民族意识的觉醒，为中国共产党“民族复兴”话语的萌芽奠定了基础。李大钊是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中阐发“民族复兴”思想的第一人，他认为中华民族已入白首之境，若要改变运命立足于世界，就必须完成中华民族的更生再造，据此他提出了“青春中国之投胎复活”^①、“旧民族复活”^②的建设构想，并将这一重任寄予在青年身上。“中华再生”“民族复活”的话语表达，也就成为了李大钊民族复兴思想的代表性符号。其他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同样关注民族复兴话题。陈独秀呼吁“吾人当一新其心血，以新人格”，由此进而“以新国家，以新社会”使“民族更新”^③。恽代英则主张“中国返老还童”“创造少年中国”。^④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的“民族复活”、“民族更新”、“少年中国”

^① 中国李大钊研究会.李大钊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313.

^② 中国李大钊研究会.李大钊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169.

^③ 张锡勤.论中国近代的“国民性”改造[J].哲学研究,2007,(06):30-35.

^④ 恽代英.恽代英全集:第五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95.

理念一脉相传，成为了共产党“民族复兴”话语的最早起源。^①抗日战争的爆发，更是将中华民族团结抗敌、共赴国难的民族精神推向了高潮，“民族复兴”的话语在这一时期成为了激励全国人民奋勇抗争的最强音。张闻天同志在《我们对于民族统一纲领的意见》中的论述，不仅是对当时民族危机深刻洞察的体现，也是对民族复兴概念内涵的深刻阐发。他提出的“御侮救亡，复兴中国”，明确指出了对外争取民族独立、对内实现民族自由作为民族复兴的核心内容，为中国共产党的民族复兴理论增添了新的思想内涵。新中国的成立，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征程上的重要里程碑。它标志着中华民族彻底摆脱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枷锁，实现了国家独立和人民解放，为后续的繁荣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从此，中华民族不再受制于内外陈旧势力的束缚，而是以前所未有的自信和动力，踏上了建设“新社会、新国家”的征程，向着民族复兴的伟大目标稳步前进。在这一过程中，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民族复兴”的话语体系也在不断地转化与重构，始终保持着与时俱进的生命力，引领着中华民族在伟大复兴的道路上不断前行。

二、 以救亡图存为核心目标

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中华民族观具有鲜明的目标指向性，即挽救民族危亡，实现中华民族的独立与解放。而“救亡图存”的目标本身就包含了两层意思：如何救亡及怎么图存？“如何救亡”我们可以将它理解为探索和实践有效的抗争策略，以抵御外辱实现解放。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基于对俄国十月革命的了解和对中国国情的深刻认识，意识到单纯依靠传统的改良或温和手段已无法挽救民族于危难之中，要实现民族的复兴，必须借鉴俄国通过激烈革命手段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经验。对此，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如瞿秋白、恽代英等提出了解决民族问题的根本方式必须把阶级斗争与民族革命统一起来，即对外反抗西方强势民族对中华民族的侵害和压榨，对内反击强大民族对弱小民族的压迫和剥削，简而言之就是民族自决。具体而言，通过民族革命来对抗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废除他们在华的一切特权，从而确保中华民族获得真正的独立与自由；同时，通过国内民主革命来推翻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傀儡——买办阶级与封建军阀的统治，走苏联道路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政权，保障中华民族内部各民族的平等发展。因而，联合国内

^① 青觉, 曹高丁. 中国共产党“民族复兴”话语的生成及意涵演化研究[J]. 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3,40(04):5-16.

各民族之力凝聚成一整体的中华民族，就成为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中华民族观的应有之义，这就为民族平等、民族联合等话题提供了存在的合理性和正当性。而“怎么图存”，则涉及到在实现民族独立后，建立一个什么样政权的国家，以确保中华民族的永续发展。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对这个问题的认识经历了一个由浅入深的过程，最终实现了从建立联邦制政权向单一制政权的认识转变和路径飞跃。在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传入之初，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如李大钊、瞿秋白、恽代英等人看到了中国与俄国相似的国情，受列宁、斯大林民族理论的影响，认为中国应紧随其后，顺应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潮流，以民族自决的形式，实现各民族的平等联合，从而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联邦制国家。这个构想照抄了苏联建国的经验，但不可否认的是，在当时迫切的国内外形势下是具有一定的合理性的。然而随着对革命斗争经验教训的深刻总结，对中国历史传统和现实境况的深入认识以及对中国境内各民族的民族情感、民族利益的理性分析后，部分马克思主义者如杨松、毛泽东等深刻认识到中国作为一个多民族国家的统一性和中华民族的整体性特征，因此，他们毅然决然地摒弃了照搬苏联模式建立联邦国家的僵化思维，转而做出了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选择：建立一个统一的人民共和国，并在少数民族聚居的区域实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①可以说，早期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中华民族观始终围绕救亡图存的目标，在实践探索中一步步得以深化、成熟。

第二节 中华民族精神的传承与创新

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有着光荣的爱国主义传统，爱国主义精神作为民族精神的核心，始终持续塑造着中华儿女的国家认同，并引领着中华民族不断向前发展。中国共产党人是近代以来爱国主义精神的继承者、弘扬者，是最坚定、最彻底的爱国主义者，他们在领导中国革命不断走向胜利的历史征程中，将爱国主义精神的灵魂熔铸到革命精神之中^②，为其注入了新的活力与内涵，使之在新的时代背景下焕发了勃勃生机。

^① 郝时远.论毛泽东的国家统一观与中华民族观:中国社会科学院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10周年学术研讨会[C],中国北京,2003.

^② 许月.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整体性论析[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9,(08):39-44.

一、 传统爱国主义精神的传承

古代中国“大一统”的整体国家观不仅是历代统治者追求的国家治理图景，也深深地烙印在中华儿女的思想脉络中，成为触发他们爱国主义情怀的潜在因素。而近代以后，随着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加深，中华民族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传统的“大一统”国家治理体系也遭到严重践踏，中华民族何去何从成为了全体中华儿女深切追寻的时代命题。在时代的呼唤下，一些先进的知识分子发现了马克思主义这强大的思想武器，并深刻意识到在当今世界格局下，中国唯有奋力击退侵略的邪恶势力，方能确保自身的生存与发展。正是在这样“生死存亡”的危难时刻以及现代国家的转型背景下，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中华民族观念体现了鲜明的“因袭吾国固有之思想”^①的特点，而在中国悠久历史进程中凝结的爱国主义思想与爱国传统，显然是这个“固有之思想”的重要内容。^②比如李大钊早年便阐明了中华儿女明确的国家归属与深沉的爱国情感，指出国民今日的救国责任首先在于认同中国是四万万国民共同的中国。只要这四万万国民不甘心国家灭亡，那么任何强大的敌人也无法在国民都还活着的时候灭亡中国。如果想要灭亡中国，那么只有与全体国民一起灭亡。其后他更是慷慨直言“国家当危急存亡之秋，国民当一心一德以御外侮，而为政府之后盾”，^③“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传统爱国主义思想袒露无疑。正是在爱国主义精神的驱动下，李大钊提出了以救亡图存为目标指向的“新中华民族主义”，他坚信通过激发全民族的爱国热情，凝聚起强大的精神力量，最终能够实现中华民族的更生再造。1919年，毛泽东在《湘江评论》发文疾呼：“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④即表达了强烈的国家认同感和归属感，以此号召有识之士特别是青年知识分子，胸怀天下大事，立志报效祖国，“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一览无余。正是在传统爱国主义精神的引领下，早期共产党人将中华民族独立作为崇高目标，号召全国各族人民紧密团结在党的周围，构筑起一个前所未有的广泛而坚固的革命统一战线。这一壮举不仅成功地抵御并打破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阴谋，更实

^① 孙中山.孙中山全集 第7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5:60.

^② 刘永刚. 1840年以降中国社会民族观的演进特征[J]. 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 2022(05):5-25.

^③ 中国李大钊研究会.李大钊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514.

^④ 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编.“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一)[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92.

现了中国的独立与统一，为中华民族的发展史增添了辉煌灿烂的一页，续写着民族复兴的伟大征程。

二、 革命斗争精神的发扬

爱国主义是一个历史范畴，不同历史阶段包涵不同的内容，体现不同的主题。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不仅承袭了爱国主义的光荣传统，而且在反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这“三座大山”的历史洪流中，将敢于斗争、不怕牺牲的革命斗争精神深深根植于爱国主义的精神内核，使之成为新的时代主题，并以实际行动将这种革命斗争精神付诸实践，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做出了巨大贡献^①。正如毛泽东所说，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是帝国主义与中国封建主义相互勾结的结果，而这一过程也恰恰是激发共产党人的反抗精神、斗争意志醒悟的关键阶段，“所有这一切侵略战争，加上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侵略和压迫，造成了中国人对于帝国主义的仇恨，使中国人想一想，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迫使中国人的革命精神发扬起来，从斗争中团结起来。……这就是精神条件，没有这个精神条件，革命是不能胜利的^②”。在民主革命时期，党的革命精神并非凭空产生的，而是深深植根于一系列鲜活、震撼且充满挑战的革命实践之中，正是这些实践孕育了内涵丰富、主题鲜明的具体革命精神，诸如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抗战精神、延安精神等。毛泽东深刻指出，唯有“发扬艰苦奋斗、不屈不挠、再接再厉的革命精神”，我们方能肩负起革命的重任，成功推翻旧世界的枷锁，建立起一个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新政权。这一思想不仅是对中国共产党和广大革命群众在革命斗争中展现出的坚韧不拔、英勇奋斗精神的肯定，更是对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在革命道路上坚定信念、勇往直前的动员和号召。恽代英作为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也深刻认识到革命斗争精神的宝贵价值，指出这种“反抗异族的”“民族性的精神”^③不仅是挽救民族危亡的重要武器，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力量。他不仅亲自领导、参与了“五卅”运动、南昌起义等武装斗争，还提出了“全国一切民众团结起来，打倒帝国主义”的战斗口号，号召全国人民发扬斗争精神，积极投身革命。共产党人对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革命斗

^① 吴伟锋.略论中国共产党对爱国主义精神的升华[J].世纪桥,2017,(03):4-5+27.

^②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 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485.

^③ 恽代英.恽代英全集 第六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358.

争精神的践行、弘扬与普及，点燃了全国各族人民不畏强暴、勇于抗争的革命热情，促使他们紧密围绕在中国共产党的旗帜下，共同致力于推翻三座大山的压迫，追求中华民族的独立与解放。

第三节 “多元”与“一体”在中华民族关系中实现了辩证统一

在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关系和格局逐步深入的探索过程中，作为 56 个民族的“多元”与中华民族的“一体”实现了辩证统一，换言之，多元与一体既相互依存又矛盾对立。一方面，多元与一体是统一而不可分割的，即一体包括多元，多元构成一体，多元与一体不可分离^①。另一方面，多元与一体又是矛盾对立的，是有所区别且彼此矛盾的两个部分^②。

一、“多元”与“一体”的统一性

近代以后，随着西方列强不断加剧的侵略步伐，国内各民族开始精诚团结，一致对外，逐渐形成了中国各族人民实际上是一个同呼吸、共命运的有机整体的普遍意识。在这个过程中，早期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站在“中华民族”的整体视野下认识中华民族与各民族之间的关系，让我们对“多元”与“一体”之间相互依存、不可分割的关系有了一步步深入的了解。如李大钊站在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视角下，将中国境内的所有国民都视为中华民族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提出“凡籍隶于中华民国之人，皆为新中华民族矣^③”。恽代英慷慨陈词“我们全中国的国民，都是同气连枝的骨肉兄弟”^④，其中“同气连枝”表明了中华各族之间的共同根源，“骨肉兄弟”则指出了中华民族是由多民族组成的大家庭，形象且生动地阐明了中华民族与各个民族不可分割的紧密关系。“五四运动之后，特别是 20 世纪 20 年代之初以后”，“在政治界、思想界、知识界和舆论界，中国各民族一体化的‘中华民族’概念和观念得以基本确立、并逐渐较为广泛地传播开来”。^⑤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离不开以李大钊、恽代英等为代表的早期共产党人对中华民族共同

^① 国家民委民族理论政策研究室编.中央民族工作会议创新观点面对面[M].北京:民族出版社,2015:2.

^② 邓吉喆,张新.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辩证统一[J].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23,(08):15-18.

^③ 中国李大钊研究会.李大钊全集:第 1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479.

^④ 恽代英.恽代英全集:第五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149.

^⑤ 黄兴涛.重塑中华:近代中国“中华民族”观念研究[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133.

体的理论建构，为激发国人自觉的民族认同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到了抗日战争时期，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基本完成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理论体系建构，不仅阐明了中华民族的起源、构成、基本内涵，而且从历史文化、民族、命运等维度不断加深对中华民族的认知，并将这些认知深化为全民族对于中华民族的自觉认同意识和心理归属感。在此基础上，他们将全民族的心理认同意识进一步转化为对日本帝国主义作战胜利的行动武器，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斗争策略，将全国各族各界各党各派的前途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极大地强化了全体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①杨松明确表明“中华民族代表中国境内各民族”，^②揭示了中华民族的一体属性。此外，毛泽东不仅直截了当地指出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的事实，强调“中华各族”由汉族和蒙、回、藏、苗、瑶、夷、番等各少数民族组成，而且通过强调少数民族在政治上、经济上、国防上对整个国家、整个中华民族的帮助，得出“没有少数民族是不行的”的结论，从而清晰地阐明了中华民族和各族之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多元一体关系和格局。正是在马克思主义者们反复不断地阐释中，多元与一体是统一而不可分割的关系得到了进一步的确认和强化，不仅极大地增强了各族人民的凝聚力和认同感，也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二、“多元”与“一体”的差异性

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中，虽然“一体是主线和方向^③，”但我们不应只看重其统一性的方面，而忽视了矛盾对立的另一面，否则容易破坏两者间本应有的辩证统一联系。必须正视二者之间的差异性，认识到他们是不同层次的民族实体，避免出现以“一体取代多元”或者混淆了二者的层次性的情况。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在探索中华民族关系的历程中，经历了由懵懂探索到思想成熟的过程，他们最终科学地认识了二者的差异性和统一性，从而正确地把握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关系格局。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如杨度、李大钊等人虽然初步认识到了中华民族的多元属性，并有意识地将民族平等作为处理多民族国家成员的基本原则，但是

^① 涂思明.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成长研究[D].南京:南京师范大学,2021.

^② 中共中央统战部.民族问题文献汇编[G].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767.

^③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政治建设的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150.

过于强调汉民族的主体地位和汉文化的同化作用，将中华民族的一体化等同于少数民族“汉化”或者被汉族同化的过程，忽视了少数民族文化的多样性和差异性，无疑将“多元”和“一体”对立起来，试图以“一元”取代“多元”，没有认识到二者的辩证统一关系。这无疑伤害了少数民族的民族情感，也不利于团结他们一致抗日。随着大革命的失败，中国共产党在领导长征的革命实践中，更加深入地接触并了解了少数民族的文化与生活，开始以更加包容、开放的视角看待中华民族、汉族以及少数民族的关系。他们认识到汉族虽然是中华民族的主体民族，在中华民族的形成与发展中起着凝聚核心的作用，但是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残酷侵略之下，国内各民族实际上已经形成了一个生死与共的命运共同体。没有国内各个民族的积极参加，中国是无法取得抗战建国的彻底胜利。因此，各民族必须平等相待，一致对外。全面抗战爆发后，杨松、毛泽东等党的领导人根据中国多民族的历史传统，深刻揭示了汉族与少数民族在长期的交流与融合中，已经形成了一个紧密相连、不可分割的整体——中华民族。这一理念迅速在全国传播并成为各族人民的广泛共识。在此基础上，共产党结合抗战斗争的宝贵经验，对解决民族问题的基本纲领进行了调整。从原先的民族自决基础上建立联邦制国家的设想，转变为在单一制国家内实施民族区域自治的政策。这一转变意味着我们党已经将多元一体的辩证统一视为解决民族问题的基本原则。这一原则深刻揭示了多元与一体的内在统一性：多元组成了一体，而一体又包容并统摄着多元。同时，它也明确阐述了一体在多元之上的主导地位，强调多元在一体的框架下实现平等发展与共同繁荣，体现了差异性中的和谐共生。这一理念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不仅精准把握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复杂关系，而且成功地将这种理解融入到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实践中，实现了理论与实践的有机融合。这种融合不仅深化了我们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认识，更为推动民族团结、促进各民族共同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和实践指导。

第五章 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中华民族观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第一节 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中华民族观的理论价值

伴随着十月革命的胜利，马克思主义有关民族定义、民族形成与发展的规律、民族平等、民族自决等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思想精髓传入中国，为早期中国马克思主义者认识、解决中国的民族问题提供了基本的理论遵循。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基于中国多民族的历史传统和革命斗争的实际进展，不断刷新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认知，使得他们对中华民族的概念、内涵、关系、结构以及中华民族复兴路径的认识也日益深化，不仅形成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初步探索的宝论成果，而且系统搭建了中华民族话语体系的理论框架。

一、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初步探索的成果

党的民族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中华民族”话语体系的建构与完善则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进程中不可或缺的历史阶段。早期的共产党人在学习、传播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过程中，不断致力于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传统文化和现实国情相结合，形成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中国化的深刻思考，最终找到了民族解放、民族平等、民族统一战线等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宝贵成果。解放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要义之一，更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的关键追求。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正是基于对民族解放的迫切需要，从而引入了“民族自决”理论，如李大钊早期便在民族解放的立场上倡导民族自决，提出“凡是亚细亚的民族，被人吞并的都该解放，实行民族自决主义^①。”也正是通过争取民族独立与解放的革命实践，早期共产党人认清了中国国情的特殊性，最终找到了民族区域自治这一具有中国特色的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在革命实践的探索历程中，将民族平等确立为管理民族事务的基石原则，标志着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在中国本土化进程中的又一个核心关注点。中国共产党关于民族平等的立场包含国际与国内两个层面：在国际上，它主张中华民族与

^① 中国李大钊研究会.李大钊全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380.

其他国家民族之间的平等；在国内，它则倡导国内各民族间的平等。可以说，中国近代革命历程中，民族平等原则作为核心要义始终贯穿于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之中。而基于本土实践形成的民族平等理论，则是中国共产党在独立领导革命斗争的实践中，通过本土化创新逐步形成的理论成果，彰显出鲜明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特征^①。从前期李大钊在“五族”的范围上初步表达了民族平等的思想开始，中国共产党就开始了对民族平等原则的初步探索。随后，恽代英进一步扩大了平等主体的范围，发出“全国各种小民族一律平等、自由^②”的口号。土地革命时期，毛泽东以宪法形式确立了民族平等原则，并在全面抗战爆发后明确提出：“允许蒙、回、藏、苗、瑶、夷、番各民族与汉族有平等权利^③。”可以看出，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在推进民族革命的进程中，对运用民族平等原则来处理各民族间的关系，经历了一个持续深化与完善的探索过程。统一战线是共产党革命实践中汲取的宝贵财富，是团结各族人民共同奋斗的重要法宝，也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在中国具体实践中得以应用和发展的关键途径。早在1919年，毛泽东就提出了“民众的大联合”的口号，并将其视为改造国家和社会的根本途径。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便着手构建了以国共合作为基石的国民革命联合战线。然而，随着大革命的挫败和长征的艰辛历程，他们及时调整策略，将视线转向了构建各民族联合的统一战线。在七七事变之后，这一统一战线更是升华为了囊括全民族、各阶级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是随着抗日战争形势的不断演变，早期共产党人在实践中深化了对统一战线的理解，也正是得益于民族统一战线的有力支撑，中国共产党得以汇聚全民族的力量，赢得了战争的决定性胜利，并最终建立了新中国。这充分展示了中国共产党在理论创新与实践探索方面的卓越能力。

二、 系统构建中华民族话语体系的理论框架

鸦片战争以后，民族独立与解放成为推动中国现代化的核心动力，而“中华民族”概念的话语出场及深入阐发，则是实现救亡图存，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必然结果。随着1902年梁启超首提“中华民族”一词，中华民族话语体系便有了初步的语汇基础。此后数十年，社会各界的精英人士围绕何为中华民族、如何建设

^① 青觉,曹高丁.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的早期历程与嬗变逻辑[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51(01):5-14.

^② 瞿秋白.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387.

^③ 中共中央统战部.民族问题文献汇编[G].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595.

中华民族这两大主题展开了激烈的讨论。特别是在“五四”运动前后，受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全球范围内民族解放运动的强烈影响，“中华民族”的观念在中国社会得到了更为广泛的传播与接受。在这一历史潮流的推动下，中国共产党逐渐登上了历史舞台。早期的共产党人，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话语传播者，高举“中华民族”的伟大旗帜，积极号召全体国民共同投身于中华民族的独立与解放事业之中，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对中华民族话语的深入阐发与灵活运用，不仅丰富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内涵，还系统性地构建了中华民族话语体系的理论框架，为后世理解和弘扬中华民族历史、文化与精神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有别于国民党试图以一元一体的中华民族构建现代民族国家的民族理念，中国共产党对中华民族的探索则是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虽然共产党的早期文件对中华民族的内涵并未作过详细说明，但他们在站位上始终承认中国多民族国家的事实，并最终实现了由汉、满、蒙、回、藏“五族”指代中华民族到“中华民族代表中国境内各民族之总称”的华丽蜕变。在这期间，他们始终秉持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平等的基本原则，使得他们对中华民族内部成员的关系和结构的认知从初期的“一体”化构想逐渐深化为“多元一体”的全面认知，为中华民族话语体系搭建了成熟的理论框架。此外，他们对中华民族复兴路径的探索，在团结对象、制度设计、精神培育等方面做了全面的规划，不仅成功完成了民族独立与解放的历史任务，为构建平等、团结、共同繁荣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确立了政治基础和制度保障，更展现了他们对“中华民族”这一话语的深刻理解和精准把握。总之，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中华民族观不仅全面科学地回答了何为中华民族、如何建设中华民族这两大时代主题，而且在这一过程中构建了系统的中华民族话语体系，为建国以后的中华民族话语叙事打下了坚实的理论根基。

第二节 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中华民族观的现实意义

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深刻阐述了历史在塑造民族认同中的核心作用，他们通过揭示各民族共同发展的历史脉络，使人们对中华民族的历史、传统和文化有了深刻而清晰的认知。这一举措不仅有力回击了帝国主义对中华民族形象的歪曲与抹黑，极大地增强了民族的自尊心和自豪感，而且深刻地启示我们，在新时代的征程中，必须始终树立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警惕并抵御民族虚无主义的侵

蚀。同时，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中华民族观念作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论基石，在革命年代成功汇聚了全民族的力量，取得了战争的绝对性胜利，为统一的新中国的诞生奠定了坚实基础。其中蕴含的团结统一的价值理念，也为应对当前各种分裂势力对国家统一和社会稳定造成的破坏，提供了强有力的现实指导与借鉴作用。

一、树立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抵制民族虚无主义

中华民族的历史是由各民族共同书写的，各民族都为中华民族的繁荣与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重要讲话指出：“我国各民族共同开拓了祖国的辽阔疆域，共同缔造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共同书写了辉煌的中国历史，共同创造了灿烂的中华文化，共同培育了伟大的民族精神^①。”“五个共同”的中华民族历史观念，贯穿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和发展的整个过程，对凝聚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动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事业意义重大。因此必须始终树立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而民族虚无主义作为一种反动的意识形态，无理否定和歪曲中华民族的历史和传统文化。这种行为不仅是对历史的极大不尊重，更是对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的严重威胁。早在民主革命时期，这种极端错误的意识形态就已经显现其危害。如日本通过否定中华民族的客观存在，把中国视为一个地理概念而不是国家组织来掩盖其侵略中国的野心，并通过挑拨离间、“以华制华”、“分而治之”的政策，企图制造民族矛盾达到分裂中国的企图。对此，早期共产党人杨松通过揭示各民族在历史长河中相互依存、共同发展的客观事实，论证了“中国人是一个民族”，并进一步阐明了中国多民族的国家的事实，强调了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关系格局，深刻阐发了中华各族“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共同体意识。这是对日本帝国主义否定中华民族历史，消解各民族对中华民族认同的有效回击。此外，毛泽东在1939年撰写的《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一文中，不仅指出中华民族历史上产生了众多的民族英雄和革命领袖，而且热情讴歌了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与光荣传统，有效的反击了日本帝国主义抹黑、丑化中华民族的企图，极大的增强了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始终强调历史在塑造民族认同和

^① 习近平.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讲话
[EB/OL].https://www.gov.cn/yaowen/liebiao/202409/content_6976962.htm,2024-09-27.

凝聚民族力量中的重要作用，正是因为深刻认识到“一个民族的历史是一个民族安身立命的基础^①。”随着近年来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在全球范围内逐渐升温，民族虚无主义这一思潮也悄然抬头。它常常打着学术研究的幌子，对我国丰富的民族历史和传统文化进行歪曲和抹黑，同时对党的民族政策进行无端指责和污蔑。这种行为不仅煽动了少数民族中的分裂势力，更是对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构成了严重威胁，从思想根源上动摇了人们对中华民族共同身份的认同。鉴于此，我们必须坚定不移地树立并弘扬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旗帜鲜明地反对民族虚无主义，深刻揭示其本质与潜在危害。通过强化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汇聚起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意志，朝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稳步迈进，早日实现这一伟大梦想。

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在古代几千年的历史沿革中，各民族经过不断交流融合逐渐成为一个民族实体。并且随着交往范围的不断扩大，融合程度的不断加深，这个民族共同体也日益发展壮大。但是彼时人们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属于这个共同体，直到近代以后列强破开中国大门，在与异族“他”者的激烈对抗中，我族与他族身份得以明确区分、界定。此时，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一种“内在驱动力”或“深层凝聚力”，在民族识别与增进民族认同的过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它不仅帮助人们清晰地认识到自己所属的民族身份，更在深层次上促进了各民族之间的情感共鸣和团结一致，为共同抵御外侮、实现民族复兴提供了强大的精神支撑。而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中华民族观念作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论起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精神内核^②。早在建党前，毛泽东便指出：“我们中华民族原有伟大的能力……中华民族的大联合，将较任何地域任何民族而先告成功^③。”不仅体现了他对中华民族历史和文化传统的肯定，更是反映了他对中华民族整体性价值的认识和重视。此后，诸多马克思主义者站在“全体中华民族”，“中华民族大联合”的角度来激发全体国民的共同体意识。七七事变后，中华民族到了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G].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94.

^② 陈佳鹏.中国共产党的中华民族观念研究(1931-1940)[D].保定:河北大学,2024.

^③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湖南省委《毛泽东早期文稿》编写组编.毛泽东早期文稿[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3:359.

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呼吁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动员全民族团结一致抵御日寇，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觉醒的重要标识，中华民族整体观念得到广泛传播和深化认同。中国共产党高举“中华民族”这一伟大旗帜，携手全国各族人民紧密团结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下，毅然奔赴抗战最前线，与侵略者展开了不屈不挠的斗争，并最终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实现了国家的和平与解放。正是在这一艰苦卓绝的斗争中，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强化和升华，成为了凝聚全民族力量的强大精神支柱。即使到了新时代，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中华民族观中所蕴含的团结统一的价值意蕴，对于我党解决新的历史时期的民族问题也具有十分重要的参考意义。特别是近年来，西方多元意识形态对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冲击，他们往往以民族分裂势力为突破口，通过煽动“港独”、“台独”、“疆独”等分裂分子，企图破坏民族团结国家统一。历史与现实均警示我们，唯有坚守正确的民族观念，不断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并制定出科学合理的民族政策，方能更有效地应对和解决我国面临的民族问题。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促进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①。”

^①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人民日报,2017-10-28(01).

结语

在 20 世纪初，伴随着全球无产阶级革命与民族解放运动的蓬勃兴起，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经由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引入中国并广泛传播。他们巧妙地以“中华民族”为旗帜，推动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在此过程中，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思想精髓与中国民族革命的实际相结合，逐渐形成了系统而深刻的中华民族观念。这一观念不仅为中华民族话语体系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也成为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在中国本土化进程中的一项重要成就。深入探究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中华民族观，不仅让我们对中华民族丰富的历史底蕴与文化内涵有了更为透彻的理解，还清晰地展现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这一历史进程中的演变脉络与不断强化的趋势。这一探索，一方面有助于我们确立科学、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另一方面也为新时代背景下巩固中华民族的团结统一、有效抵御各种分裂势力的干扰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支撑与思想动力。

本文专注于剖析以杨度、李大钊、恽代英、瞿秋白、杨松及毛泽东为代表的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思想脉络，重点考察他们中华民族观念的形成与发展轨迹，并精心提炼其民族思想的核心要义。此举旨在填补当前学界在中华民族观念研究领域的某些空缺，尤其是针对中国共产党先驱者民族思想整合研究的不足。当前研究往往要么泛泛地讨论中国共产党的整体民族观，要么局限于个别领导人的民族思想，缺乏系统性与连贯性。本文则尝试打破这一局限，通过整合这些先驱者的思想，从一个新颖且深入的视角，勾勒出中华民族观念历史变迁的轮廓。然而，受篇幅限制及个人研究能力的局限，本文在展现这些先驱者全面而丰富的民族理念方面，仍有待完善，这无疑是一个遗憾之处。但笔者深信，本文至少能为后续学者提供一个起点，为他们开展更为科学、系统且全面的研究提供一丝启发与参考。笔者期待，本文能如同引玉之砖，激发更多学者对中华民族观念演变历程的深入探索与解读。

参考文献

一、外文译著

- [1]黑格尔.法哲学原理[M].范杨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
- [2]卢梭.社会契约论[M].何兆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 [3]松本真澄.中国民族政策之研究——以清末至 1945 年的“民族论”为中心[M].鲁忠慧,译.北京:民族出版社,2003(1).

二、中文著作

- [1]费孝通主编.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修订本)[M].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9.
- [2]国家民委民族理论政策研究室编.中央民族工作会议创新观点面对面[M].北京:民族出版社,2015.
- [3]黄兴涛.重塑中华:近代中国“中华民族”观念研究[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
- [4](汉)贾谊.贾谊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
- [5]李达.李达文集 第 1 卷[G].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 [6]李维汉.统一战线问题与民族问题[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 [7]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 [8]梁启超.饮冰室合集 专集 4[M].北京:中华书局,1989.
- [9]梁启超.梁启超全集(第二集)[M].汤志钧,汤仁泽,编.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
- [10]刘晴波主编.杨度集[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90.
- [11]吕思勉.中国政治常识[M].成都:天地出版社,2019.
- [1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
- [13]毛泽东.毛泽东文集 第六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 [14]毛泽东.毛泽东选集 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15]瞿秋白.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 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
- [16]任建树.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一卷[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 [17]斯大林.斯大林选集:上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 [18]司马光.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2017.
- [19]孙中山.孙中山全集 第7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5.
- [20]王溥.唐会要·北突厥条[M].北京:中华书局,2017.
- [21]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3)[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
- [22]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
- [23](梁)萧子显.南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2.
- [24]恽代英.恽代英全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
- [25]张刚,伍雄武.云南民族关系的历史与经验[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
- [26]张莘,张磊.孙中山卷(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
- [27]中共中央马克思 恩格斯 列宁 斯大林著作编译局.列宁选集 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 [28]中共中央马克思 恩格斯 列宁 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 [29]中共中央统战部.民族问题文献汇编[G].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
- [3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湖南省委《毛泽东早期文稿》编写组编.毛泽东早期文稿[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3.
- [3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文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 [3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G].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
- [3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政治建设的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
- [34]中国李大钊研究会.李大钊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 [35]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等[M].孙中山全集 第2卷,北京:中华书局,1982.
- [36]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研究编.斯大林论民族问题[M].北京:民族出版社,1990.
- [37]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编.马克思恩格斯论民族问题[M].北京:民族出版社,1987.
- [38]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编.“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一)[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39]中央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教研室编.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民族问题著作选[M].内部发行,1985.

三、外文文献

[1]J.K.Bluntshli, The Theory of the State[M].Oxford English Version,1892.

四、中文论文

[1]安兴伟.毛泽东关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思想与实践研究[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13.

[2]陈佳鹏.中国共产党的中华民族观念研究(1931-1940)[D].保定:河北大学,2024.

[3]陈连开.论中华文明起源及其早期发展的基本特点[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0,(05):22-34.

[4]陈艳飞.中国共产党中华民族观的演变及其影响(1921—1949年)[D].北京:中央民族大学,2005.

[5]崔玉军.西方关于中国民族主义的研究:范式与主题[J].国外社会科学,2009(05):114-121.

[6]邓吉喆,张新.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辩证统一[J].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23,(08):15-18.

[7]丁橡雨,周显信.论毛泽东民族团结思想的深刻内涵及当代发展[J].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13(01):10-15.

[8]顾颉刚.中华民族是一个[J].益世报·边疆周刊,1939(09):1.

[9]郭汉民,袁洪亮.近代中国国民性改造思潮简论[J].广东社会科学,2000,(06):93-97.

[10]郭艳.周恩来民族团结思想研究[D].兰州:西北民族大学,2011.

[11]韩颂刚.瞿秋白民族革命思想研究[D].济南:山东大学,2020.

[12]郝时远.论毛泽东的国家统一观与中华民族观:中国社会科学院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10周年学术研讨会,中国北京,2003[C].

[13]郝时远.中文“民族”一词源流考辨[J].民族研究,2004(06):60-69.

[14]黄兴涛.现代“中华民族”观念形成的历史考察——兼论辛亥革命与中华民族认同之关系[J].浙江社会科学,2002(01).

- [15]孔亭.“中华民族”的概念内涵及其演变[J].湖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42(05):12-20.
- [16]李惠康,訾亚军.论毛泽东对新疆自治区建立的贡献[J].内江师范学院学报,2015,30(01):98-101.
- [17]李涛容.李大钊民族复兴思想研究[D].长春:吉林建筑大学,2023.
- [18]李珍.论周恩来民族平等思想——“事实上的真正的平等”[J].传承,2014,(05):32-33.
- [19]李臻,金炳镐.西方学界关于中国共产党中华民族观的研究初探——读詹姆斯·雷博德的《重构中国民族主义:从清朝的边疆民族到中华民族》[J].西北民族研究,2016(02):73-82.
- [20]李臻.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中华民族观的转型与发展[J].民族论坛,2013,(05):17-19.
- [21]李贽,孟凡东.民族自觉、民族自为到民族复兴: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逻辑演进[J].江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6).
- [22]梁雪村.错置的议题:西方中国民族主义研究的得与失[J].外交评论(外交学院学报),2015,32(02):29-48.
- [23]林春逸,刘丽萍.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中华民族观演变探究[J].广西民族研究,2024,(01):1-8.
- [24]刘永刚.1840 年以降中国社会民族观的演进特征[J].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2022(05):5-25.
- [25]吕昭义,李志农,吴彦勤.中国国家现代化历程与中华民族的觉醒[J].思想战线,2002,28(2):63-69.
- [26]罗庶长.周恩来的民族观和他对建立广西壮族自治区的贡献[J].广西民族研究,1998,(03):13-15.
- [27]马进卫.浅析周恩来的民族观[J].云南社会科学,1999,(S1):128-131+166.
- [28]孟凡东,闫奕澎.命运共同体理念转型:杨松中华民族观念及其新时代价值[J].黑龙江民族丛刊,2024,(02):45-54.
- [29]娜仁琪琪格.毛泽东的民族区域自治思想研究[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8,(02):61-64.
- [30]聂长久,张敏.论瞿秋白的民族观[J].吉林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9,(01):27-30.

- [31]祁庆富:记述中华民族历史的开山力作——《中华民族史》评介[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1,(02):137-138.
- [32]乔兆红.阐释与启示:海外关于中国民族主义问题的研究[J].安徽史学,2017,(05):56-62.
- [33]青觉,曹高丁.中国共产党“民族复兴”话语的生成及意涵演化研究[J].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40(04):5-16.
- [34]青觉,曹高丁.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的早期历程与嬗变逻辑[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51(01):5-14.
- [35]茹莹.汉语“民族”一词在我国的最早出现[J].世界民族,2001(06):1.
- [36]桑杰.关于毛泽东民族区域自治思想的几点思考[J].当代中国史研究,2014,21(01):121.
- [37]施芳.中国民族史史学研究述论[D].昆明:云南大学,2012.
- [38]松本真澄,鲁忠慧.评日本及欧美学者对中国民族问题之研究[J].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2):17-23.
- [39]宋月红.毛泽东关于新中国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决策研究[J].中国藏学,2008,(03):128-137.
- [40]孙军.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早期进程研究(1921-1938)[D].北京:中央民族大学,2011.
- [41]覃生.中华民族史研究的新成果——评我国第一部《中华民族史》[J].天府新论,2002,(04):94-95+97.
- [42]汤庭芬,黄永明.毛泽东关于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的学说[J].社会主义研究,1993,(06):12-16.
- [43]王丽霞.李大钊民族复兴思想研究[D].长春:东北师范大学,2021.
- [44]王锐.锻造“政治民族”——李大钊“新中华民族主义”的理论意涵[J].开放时代,2019,(02):122-135+8-9.
- [45]吴汉全.瞿秋白与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中国化[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06):42-45.
- [46]吴伟锋.略论中国共产党对爱国主义精神的升华[J].世纪桥,2017,(03):4-5+27.
- [47]夏良才.孙中山的国家观与欧洲“主权国家”学派[J].近代史究,1992,(05).
- [48]肖银洁,吕宏山.中国共产党培育与弘扬中国精神的百年历程与经验[J].马克思

主义理论研究,2023,(01):183-199.

[49]谢泽栋.恽代英民族思想研究[D].北京:中央民族大学,2023.

[50]徐杜海,周红禄.周恩来的民族平等思想与实践[J].重庆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05):11+110.

[51]许月.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整体性论析[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9,(08):39-44.

[52]杨波.瞿秋白民族观研究[D].秦皇岛:燕山大学,2015.

[53]杨耀,张宇,姜爱军.论毛泽东民族区域自治思想在内蒙古的实践[J].理论研究,2013,(06):22-28.

[54]于风政.论中华民族建设的主线与方向——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再思考[J].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36(03):10-16.

[55]岳凯娜.毛泽东民族平等思想及其当代价值研究[D].太原:山西师范大学,2020.

[56]张纯,侯典举.从联邦制的民族自决走向单一制的民族区域自治——中国共产党对民族政策的探索之路[J].黑龙江民族丛刊,2016,(06):19-25.

[57]张红,郑信哲.李维汉对中国共产党民族工作的重要贡献及其启示[J].贵州民族研究,2022,43(02):7-13.

[58]张三南,吕伟波.李大钊《新中华民族主义》探析[J].甘肃社会科学,2014,(04):51-54.

[59]张少春.团结与改造:周恩来民族团结思想研究[J].思想战线,2024,50(04):51-62.

[60]张太原.抗日战争与中共的中华民族观的形成[J].中共党史研究,2016,(03):52-62.

[61]张锡勤.论中国近代的“国民性”改造[J].哲学研究,2007,(06):30-35.

[62]张忠江,陈秀英.论周恩来的民族观——纪念周恩来诞辰 100 周年[J].黑龙江民族丛刊,1998,(02):30-32.

[63]赵建利.毛泽东民族观研究[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01):77-83.

[64]赵壮道.李大钊“新中华民族主义”思想及其影响[J].史学月刊,2019,(08):130-132.

[65]郑大华.李大钊“民族自决”思想的再研究[J].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20,49(04):83-90.

[66]郑大华.论抗战时期知识界的“中华民族”观念及其差异[J].中国文化研究,2023(3).

[67]郑大华.论杨度的“中华民族”观及其历史地位[J].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

报.2019,48(02),102-109.

[68]郑大华.民主革命时期中共的“中华民族”观念[J].史学月刊,2014,(02):48-54+136.

[69]郑师渠.辛亥革命后关于国民性问题的探讨[J].天津社会科学,1988,(06):39-45+25.

[70]郑师渠.中华民族实现由自在转向自觉的鲜明标志——论李大钊的《新中华民族主义》[J].史学史研究,2020,(04):17-20.

[71]周平.中华民族观念的时代意义[J].理论与改革,2023(03):43-56.

[72]周忠瑜.浅谈李大钊的民族平等和民族自决思想[J].青海民族学院学报,1989,(03):36-40.

[73]朱婷婷.李大钊民族复兴思想探究[D].西安:陕西师范大学,2021.

五、报纸文章

[1]毛泽东.在庆祝和平解放西藏办法达成协议的宴会上致词[N].人民报,1951-5-24.

[2]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人民日报,2017-10-28(01).

六、电子文献

[1]习近平.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讲话

[EB/OL].https://www.gov.cn/yaowen/liebiao/202409/content_6976962.htm,2024-09-27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1] 黄玲玲.思政课话语叙事转变的实现路径探究[J].新丝路, 2025, (04): 162-164.
- [2] 黄玲玲.从《放翁家训》出发浅析陆游的家庭教育思想[C]. “‘两个结合’与新时代伦理学新使命”学术研讨会暨安徽省伦理学学会 2023 年学术年会论文集, 2023, 429-434.
- [3] 韩旭,黄玲玲,凤权.产出导向理念下“纺织工程专业前沿”课程的教学改革探析[J].山东纺织经济, 2022, 39(10): 38-41.

致谢

行文至此，几近尾声。回想这三年的研究生生涯，似乎每一年都有不一样的心境，研一时的踌躇满志，研二时的彷徨摸索，研三时的潜精研思，沉淀了两年我慢慢地进入了研究的状态，也开始享受这种每天沉下心待在图书馆码字的感觉，却又不得不面临着毕业的无情问候。回首三年时光，虽然没那么忙碌，却也充实，在学识、眼界和个人能力上都得到了锻炼与成长。这一切的成就，都离不开恩师的悉心指导、爱人的默默支持以及学院所有老师的谆谆教诲。

首先我要感谢的是我的导师张刚教授。他为人随和，语言质朴，他永远不会对着我们讲深奥晦涩的大道理，不论是在学术研究上还是生活指导方面，始终力求以浅显生动的语言传达学问、指点人生。在学术研究上，他也总是给我们提供最大的自由与选择，他会鼓励我们探寻感兴趣的论文话题，并给我们提供专业的建议与指导，也会通过每两周一次的组会跟进我们的学习进展，让我们能够把握好学习的节奏与进度。我的毕业论文从最初的选题，到框架的设定与修改，再到后期细节的打磨，他都事无巨细地一一过目并帮助我不断完善。感谢他始终如一的耐心教导，让我能安心地完成这篇文章，同时也让我对如何写文章有了更多的理解与心得。我还想特别感谢的是他对我一直以来的鼓励与支持，对于一个 90 年的女研究生来说，对未来的迷茫和焦虑可能更甚于我的“00”后同学们，我不知道放弃了安逸清闲的工作选择读研是否真的会让一切变的更好，甚至有时候会怀疑自己该不该读研，但是我却深深的记得某天当我表达了这个疑问时，他眼神坚定地对我说“读书永远都不会错”，我想正是那一句话，在这三年中无数个彷徨无助的瞬间给了我坚定的支撑和继续前进的勇气。在他身上我也深切地感受到了“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的生动映照。所以，我想由衷地对张老师说一声：“谢谢您！”借此机会，我也想向导师的爱人宋老师表达深深的感谢，不管是作为我的前同事还是如今的“师母”，感谢你一直以来对我的关心与帮助，我将永远铭记于心。

我尤其要感谢我的爱人，这三年来，如果没有他在各方面的全力支持与无私帮助，我难以如此顺利地完成学业。无论是孩子的教育，还是家中的琐碎事务，他都竭尽所能地分担，确保我能心无旁骛。即便是在寒暑假假期，他也始终将我的

学习放在首位，为我营造了一个宁静舒适的学习环境，让我能够毫无后顾之忧地专注于学业。特别让我感动的是，在我对未来方向感到迷茫和困惑时，他总是以“但行好事，莫问前程”的话语开导我，给予我坚定的支持。在我求职的过程中，他更是耐心地帮助我修改简历，突出我的优势，让我避免了许多不必要的曲折。他始终如一的陪伴与支持，是驱动我勇往直前的源源不竭的动力。此外，感谢双方父母对我无私的包容与支持，正是由于你们的奋力托举，才让我的读研之路少了诸多后顾之忧。

其次，我要向学院的所有老师表达我最深的感激之情。在学术探索的征途中，我有幸遇到了众多杰出的老师，如陈金香老师、毛加兴老师等。他们的课堂不仅仅是知识的传授，更是智慧的碰撞与启迪的源泉。每位老师都以其深厚的学术功底和独到的见解，将复杂的理论以深入浅出的方式呈现，让我得以轻松跨越知识的门槛，收获满满。此外，我还要特别感谢那些在学生管理工作中默默奉献的老师们，包括裴利萍老师、李德才老师、王明老师等。他们不仅关注我们的学业，更关心我们的成长与发展。无论是学习上的困惑，还是生活中的难题，他们总是及时伸出援手，给予我们最贴心的帮助与支持。正是有了他们的辛勤付出，我们才得以在一个和谐、有序的环境中安心学习，不断进步。

最后感谢前行路上给我提供帮助与温暖的所有小伙伴们，是你们让我的研究生涯变得更加充实和精彩。然经此一别，山高水长，唯愿诸君此去提衡霄汉上，鹏抟鲲运更论程。

最后的最后，感谢走得很慢，但一直向前的自己！